

德福關係的沉思：多向度德福觀 構念模式之建構

林鈺傑¹、陳舜文¹

本文將「道德與幸福如何關聯的信念」稱為「德福觀」。過去心理學之德福關係研究可分為兩類研究典範：幸福理論和正義信念，但都未對德福觀提供有效清楚的分析，因此限縮了理論的發展和應用。本文旨在提出可以更切實地理解人們德福觀的理論。本文首先回顧心理學典範，並進行系統性分析和批判；其次梳理德福論哲學，探討其中的心理結構。本文建構出涵攝德福論哲學，並可以進行研究操作的「多向度德福觀」心理構念模式。此模式將德福觀區分為四個基本構念：內在調和、外在調和、積極調和、消極調和；以及四個複合信念：內在積極調和、內在消極調和、外在積極調和、外在消極調和。「多向度德福觀」構念模式有助於釐清現有理論的混亂不明或矛盾之處，未來可以發展測量工具，並探討德福觀與其他道德心理與行為的關聯與機制，也可進一步在道德實踐與教育上提供實用建議。

關鍵詞：德福觀、道德心理學、幸福理論、正義信念

¹ 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

通訊作者：陳舜文，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spsychen@yahoo.com.tw。

道德與幸福的關係，是道德哲學的重要議題，從東西方哲學發軔時便已提出，並引發相當豐富的思考和討論（孫效智，2002；Bok, 2010; McMahan, 2004, 2006; Mieth, 2017）。「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是常民的普遍信念。當我們要證成道德的理由時，也常直覺地訴諸幸福因素。過去研究顯示，道德與幸福在概念上有所重疊，無論是在一般大眾或是專家的幸福概念中，道德價值都構成重要部分（Phillips et al., 2017）。但是，若進一步深思具體的生活事件時，就會發現兩者之間不必然有因果關係，甚至可能存在衝突。例如：坦承工作上的嚴重錯誤，可能會遭懲處或解雇的個人幸福風險；追求個人愛情幸福，可能會導致違背或拋棄家庭責任之責難；符合環保的生活方式可能需要犧牲許多生活便利和享受；慈善捐款與個人生活福祉之間可能存在財務分配的衝突等。甚至存在「好人長命，禍害遺千年」、「小人得志，君子道消」的諺語來描述「德福不一致」的現象。因此，德福之間的差異或衝突只是表象的暫時分歧，還是本質的不一致，就成為值得探討的議題。

本文將「道德與幸福如何關聯的信念」稱為「德福觀」（beliefs about congruent good）。探討德福觀之內涵，無論從抽象的哲學思想到具體的實踐應用都具有重要意義。在思想方面，德福關係議題涉及道德和幸福的本質與判準（邱振訓，2015；孫效智，2002；Tsai, 2023）。在應用方面，道德教育、幸福教育，以及公共政策都經常援引德福觀的論述。道德教育常藉由宣揚「德福一致」的觀念，勸說人們依循道德原則行事；幸福教育亦常將實踐道德作為實現幸福的方法之一；公共政策則經常採用「德福一致」的論述作為政策倡議和溝通的重要策略（例如，余民寧、陳柏霖，2014；陳伊琳，2016，2018；黃藿，2000；Arvanitis & Stichter, 2023; Carr, 2024; Duncan, 2010; Henricson, 2016; Kristjánsson, 2019; Lakoff, 2008; Nili, 2019; Ottaviani, 2024; White & Kern, 2018）。因此，建構心理學理論和測量工具來分析與測量人們的德福觀，應可對道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以及公共政策之分析與推廣有所助益。舉例而言，道德教育若針對不同德福觀的人採取不同的理由或論述，可能可以提高教育的適配性；探討德福觀在幸福中所扮演的角色，可能可以深化我們對幸福本身，及其保護因子和風險因子的認識；若以德福觀作為分析公共政策底層邏輯的視角，可能有助於決策、談判和尋求共識。

從道德心理學（moral psychology）來看，德福觀是一種道德信念。一些研究者指出，人們的道德信念可以用「多重行動理路」（multiple rationales of action）（葉啟政，2000）和「雙重歷程模式」（dual-process model of moral judgment）來分析（陳舜文、邱振訓，2011）。「多重行動理路」的觀點認為，社會世界存有多層且多元的行動理路，並且主導人們的互動。這些理路可歸納為實作理路、論述理路及結構理路三個層次。「實作理路」是指人在特定情境和動機之下，透過當下認知和感受經驗形成的行事習慣模式。人們對於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種種實作理路常會建構出「論述理路」，亦即具有一定程度邏輯的體系化論述，以解釋自己的行為。當某種論述理路在社會中取得優勢地位，形成外在於個體，而且對個體行為具有定義或規範作用之論述，便可稱為「結構理路」。三重理路的區分可從「雙重歷程模式」進一步說明。此模式認為，人們的道德判斷包含兩種心智歷程：「自動歷程」與「精緻歷程」。簡言之，自動歷程是下意識的心智直覺，精緻歷程則是有意識的深入思考。進行道德判斷時，個體常透過自動歷程產生直接的道德情緒與直覺反應，這些反應可對應於「實作理路」。而「論述理路」則涉及精緻歷程，人們會有意識地思考社會事件，並對道德判斷作出論述。「結構理路」則是外在於個體的既有文化社會價值系統，可主導或規範該社會中人們的道德論述與行動。

就德福觀而言，文化社會價值系統中的宗教教義、哲學思想都屬於具有規範指導作用的結構理路，含有豐富精緻的德福關係論述，本文將此類論述統稱為「德福論哲學」（philosophy of congruent good）。例如，基督宗教的末日審判、印度宗教的業報輪迴、希臘古典哲學與儒家哲學的德福調和論等。然而，結構理路的德福論哲學雖然豐富細緻，但一般大眾通常難以完整理解或完全採納。對個體而言，這些論述常會滲入其自動歷程和精緻歷程，揉合生活中各種認知、情感和經驗，形成個人獨特的實作或論述理路，構成個體對於德福關係的信念，此即為本研究欲探討的德福觀。

過去心理學之德福關係研究可分為兩類研究典範（research paradigm）：幸福理論（well-being theories）和正義信念（justice beliefs）。幸福理論研究典範嘗試確認幸福與道德的實然關係，以此建立構念和蒐集實徵資料。正義信念之典範則從個體主觀信念的角度切入，懸置德福之間實然關係的問題，探討正義信念之認知和心理行為機制。然而本文認為，無論何種研究典範都未對德福觀提供有效清楚的分析，因此限縮了理論的發展和應用。究其原因，很可能是因為當前之德福關係心理

學研究典範都對德福論哲學涵攝不足，導致片面或簡化解釋了德福觀。

為了更切實地理解人們的德福觀，本文提出「多向度德福觀」(multi-dimensional beliefs about congruent good)之心理構念模式。此模式將德福觀區分為四個基本構念：內在調和、外在調和、積極調和、消極調和。「內在調和」是指相信道德與內在幸福的調和程度；「外在調和」是指相信道德與外在幸福的調和程度；「積極調和」是指相信行善增進幸福的程度；「消極調和」是指涉相信作惡損害幸福的程度。此四個基本構念可以再交叉組合成四個複合信念：內在積極調和、內在消極調和、外在積極調和、外在消極調和。

以下本文將先回顧與反思涉及德福關係的心理學研究，接著梳理德福論哲學之相關概念。最後將詳細闡述「多向度德福觀」之模式，以及此模式未來的研究與應用方向。

現行德福關係的心理學研究反思

心理學中涉及德福關係的研究主要有兩類研究典範：幸福理論與正義信念。幸福理論典範又可分為兩種主要取向：享樂幸福觀(hedonic well-being perspective)和美德幸福觀(eudaimonic well-being perspective)。正義信念研究典範則關注於「公正世界信念」(belief in a just world)，以及經常用來解釋公平正義機制的各種超自然信念。以下分別針對兩類研究典範進行闡述與反思。

(一) 幸福理論研究典範之回顧

1. 幸福理論中的德福關係

概括而言，心理學的幸福理論研究典範存在兩種對於「幸福」的界定：享樂幸福觀和美德幸福觀。前者源於伊比鳩魯(Epicurus, 341–270 B.C.)的享樂主義倫理學(hedonic ethics)，後者奠基於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384–322 B.C.)的德行倫理學(virtue ethics)。享樂觀取向將幸福界定為愉悅感、正向情緒，以及生活滿意之綜合(Lucas et al., 1996; Sumner, 1996)。美德觀取向則認為幸福是個人理想的生活狀態，愉悅和樂趣僅是個體達致理想狀態的副產品(Ryan & Deci, 2001)。上述觀點差異分別形成兩種不同的幸福構念：主觀幸福(subjective well-being)和心理幸福(psychological well-being)。享樂觀取向重視「主觀幸福」，亦即個體的主觀經驗和心理狀態(mental states)；美德觀取向強調「心理幸福」，亦即個體的客觀心理功能(psychological functions)和特質(traits)。已有許多研究表明主觀幸福和心理幸福在實徵資料中是相關但區別的構念(例如，Chen et al., 2013; Joshanloo, 2016)，但也有一些研究顯示兩者之間的區辨效度微小(例如，Disabato et al., 2016)，目前兩種觀點仍存在爭論。

表 1
幸福理論研究典範之比較

幸福觀	享樂觀	美德觀
哲學根源	享樂主義倫理學	德行倫理學
心理學構念	主觀幸福	心理幸福

享樂觀取向採取工具性關係(instrumental relationship)的立場，探討道德與幸福之關係。更清楚地說，享樂觀取向多探討主觀幸福的決定因素(determinants)以及心理歷程。針對與幸福有關的決定因素，Dolan 等人(2008)整理出七個範疇：收入、個人性格、社會發展的特徵、時間分配方式、社會生活態度和信仰、人際關係，以及更廣泛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環境。Azizan 與 Mahmud (2018)則整理出四個範疇：個人特質、社會經濟地位、健康、宗教承諾與靈性。在心理歷程方面，Kahneman (1999, 2000)提出「峰尾原則」(peak-end rule)和「快樂適應性原則」(hedonic adaptation rule)。「峰尾原則」區分經驗當下和事後回憶的苦樂感差異，並發現人們回憶的苦樂感主要取決於愉悅或痛苦經驗的高峰值和末尾值。「適應性原則」闡明情緒感受的習慣化和人類適應變化的天性能力。人們在經歷重大情緒轉變之後，無論是遭逢正向或負向事件，大都會逐漸回復至

個人的一般水準（也有例外情況，例如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可能轉為敏感）。適應性原則關於愉悅感有重要的啟示：愉悅感是對變化的反應，而非固定狀態，感受的是變量而非定量，所以難以最大化（Frederick & Loewenstein, 1999; Millgram, 2000）。

享樂觀取向所形成的幸福構念是主觀幸福（subjective well-being）。通常使用以下三種心理計量工具來測量。主觀幸福量表（The Subjective Happiness Scale）（Lyubomirsky & Lepper, 1999）、生活滿意度量表（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Diener et al., 1985）、正負向情緒量表（the PANAS scales）（Watson et al., 1988）。這三種量表已在大量研究中使用，並都維持穩定良好的信效度品質。主觀幸福量表由四個題目組成，是最簡約的測量工具。第一個題目評估絕對幸福感（「一般而言，我認為自己：1 = 不是一個很快樂的人；7 = 是一個很快樂的人」），第二個題目評估相較於同儕的相對幸福感（「跟大部分同儕相比較，我認為自己：1 = 比較不快樂；7 = 比較快樂」），後兩個題目評估幸福感特質的程度，同樣使用 7 點 Likert 量表計分（1 = 不符合；7 = 符合）。內部一致性 α 係數在不同地區的範圍是 .74 到 .86（Disabato et al., 2016）。Chien 等人（2020）研究主觀幸福量表中文化的心理計量品質，結果顯示內部一致性 α 係數為 .84，驗證性因素分析顯示單因素的模型適配度最佳。

享樂觀取向的研究中，直接涉及德福關係議題的是探討利他（altruism）與主觀幸福的關係。Rhoads 與 Marsh（2023）指出，雖然有大量跨文化社會的研究支持利他與主觀幸福具有正向關聯，但大多數研究都是採用相關研究法，理論上可能存在雙向的交互影響關係，因此他們進一步整理探討兩者因果關係的研究。針對利他引發主觀幸福，雖然利他通常會付出成本，但有許多研究支持幫助他人（包括金錢、勞力、捐血等形式）會增加主觀幸福，效果量大多在低到中等範圍。利他行為所引發的正向情緒有時候會被描述為「溫暖光芒」（warm glow），其內容為滿足感和一般正向情緒。此外，受益者與利他者的親近性、利他者的自願性、利他行為的非計劃性等因素，都會提高其利他影響主觀幸福的強度。針對主觀幸福促進利他，大規模的社會調查研究發現，提高客觀幸福感（包括擁有更多資源、更好的健康和更高的社會地位等），可提升各種形式的助人行為。一些實驗研究顯示，暫時引發正向情緒可導致更多的助人行為，但負向情緒的突然變化（包括急性壓力或恐懼），也可能激發助人行為。當正向情緒是由於得到他人的幫助而產生，更有可能增加代價高的利他行為。Rhoads 與 Marsh 總結：利他行為和主觀幸福之間存在互為因果的關係，彼此雙向影響，因此可能形成利他行為的自我增強（self-reinforcing）。然而此相互因果關係的影響因素相當複雜，需要更多長期縱貫研究釐清。現有研究指出幾種可能機制。一種可能的解釋是利他行為透過同理心（empathy），提升助人者的正向情緒。另一種可能解釋是利他行為帶來更多社會酬賞，例如獲得社會認可、聲譽或社會連結。

美德觀取向支持者多認為人的理想狀態相當多元，因此提出許多理論來描述心理幸福的各項層面。Ryff（1989）最早綜合各家理論，提出六個向度來描述和界定心理幸福：自我接納（self-acceptance）、生活意義（purpose in life）、個人成長（personal growth）、正向人際關係（positive relations with others）、環境掌控（environmental mastery）和自主（autonomy）。Seligman（2011）將「幸福」的內涵統整為五個核心元素：正向情緒（positive emotion）、參與投入（engagement）、正向關係（positive relations）、意義（meaning）和成就（achievement），簡稱 PERMA，並以「心盛」（flourish）這個概念描述幸福五元素和諧圓滿的狀態。Su 等人（2014）整合 Ryff 的心理幸福理論、Ryan 與 Deci（2001）的自我決定理論、Seligman 的心盛理論，提出心理幸福的六向度：關係（relationships）、投入（engagement）、意義（meaning）、掌控（mastery）、自主（autonomy）、樂觀（optimism）。

美德觀取向的不同理論構念各自發展出相應的心理計量工具。依據心理幸福理論構念發展成的心理幸福量表（The Scales of Psychological Well-Being）包含對應心理幸福六個向度的分量表（Ryff, 1989）。Ryff 與 Keyes（1995）進一步發展出簡短版本，每個分量表包含三個題目。使用 7 點 Likert 量表。李仁豪與余民寧（2016）研究心理幸福量表簡式中文版的心理計量品質，研究發現，符合理論架構的六因素斜交模型獲得良好的適配；在信度方面，分量表內部一致性 α 係數在 .73 ~ .87，總量表高達 .91；分量表間隔 2 ~ 3 週的再測信度介於 .59 ~ .65，總量表則達到 .70。在效度方面，因素負荷量在 .65 ~ .92，具有聚斂效度，而因素間的相關性在 .30 ~ .72，通過區辨效度的檢驗。

上述美德觀幸福理論在探討幸福本質的同時也提出了致福之道，其中也涉及道德與幸福的關

係。美德觀取向特別重視美德 (virtue) 與幸福之間的關聯，並開展許多實徵研究，檢驗兩者之間是否具有正向關聯或因果關係。Peterson 與 Seligman (2004) 建立一套「性格優勢」(character strengths) 分類系統「行動中價值觀」(values in action, VIA)。「性格優勢」是指具有正向價值的人格特質，可歸納為六項核心美德 (core virtues)，各項美德包含幾項性格優勢，共歸納出 24 項性格優勢，詳如表 2。關於 24 種性格優勢之間關係的幾項研究表明，五因素的適配度最佳 (例如，Ruch et al., 2014; Shryack et al., 2010)。高階優勢因素通常被標記為：情緒優勢 (emotional strengths) (例如，社會智力、勇氣)；人際優勢 (interpersonal strengths) (例如，團隊合作、善良)；節制優勢 (strengths of restraint) (例如，堅毅、審慎)；神學優勢 (theological strengths) (例如，靈性、感恩)；智力優勢 (intellectual strengths) (例如，好奇心、愛好學習)。

表 2
VIA 系統的美德與性格優勢

美德	性格優勢
智慧與知識 (wisdom and knowledge)	創造力 (creativity)
	好奇心 (curiosity)
	判斷力 (judgment)
	熱愛學習 (love of learning)
	洞察力 (perspective)
勇氣 (courage)	勇敢 (bravery)
	堅毅 (perseverance)
	真誠 (honesty)
	熱情活力 (zest)
仁愛 (humanity)	愛 (love)
	善良 (kindness)
	社交智慧 (social intelligence)
公義 (justice)	團隊合作 (teamwork)
	公平 (fairness)
	領導力 (leadership)
節制 (temperance)	寬恕 (forgiveness)
	謙虛 (humility)
	審慎 (prudence)
	自律 (self-regulation)
超越性 (transcendence)	欣賞美麗與卓越 (appreciation of beauty and excellence)
	感恩 (gratitude)
	希望 (hope)
	幽默 (humor)
	靈性 (spirituality)

迄今為止已有許多實徵研究探討性格優勢與幸福存的關聯 (例如，梁進龍等人，2021；粘瑞狄等人，2020；Azañedo et al., 2021；Hausler et al., 2017；Karris Bachik et al., 2021；Niemiec, 2023；Wagner et al., 2020；Weber, 2021)。Hausler 等人 (2017) 以醫學生為樣本進行兩個時間點的測量，探討性格優勢與主觀幸福和心理幸福之間的關係。研究發現，整體而言，良好性格與心理幸福的關聯性顯著高於主觀幸福感，尤其以希望、熱情活力、感恩、好奇心和愛這五種性格優勢與兩種幸福都有相關。進一步檢視特定性格優勢與幸福之間的關聯，發現「希望」優勢與心理幸福的「意義」、「樂觀」和「自主性」構面，「熱情活力」優勢與心理幸福的「關係」和「投入」構面，都有中等以上的相關性。Wagner 等人 (2020) 以橫斷研究分析性格優勢與幸福五向度 (PERMA) 的關聯，結果顯示，在自陳報告中，所有性格優勢都與五向度呈正相關，但關係的大小有所不同。例如，成就向度與洞察力、堅毅、熱情活力等優勢顯示出最強的關聯。而在知情人 (informant) 報告中，對於正向關係向度，團隊合作、愛和善良等優勢是最佳預測因子。Azañedo 等人 (2021) 以 1,494 名西班牙大學生為樣本進行調查研究，檢驗性格優勢在解釋主觀幸福、心理幸福和心理病理的變異的增量效應。研究結果顯示，神學優勢對主觀幸福的生活滿意度、正向情緒、情緒平衡，以及心理幸福的人生目

的、自我接納、環境掌控、與他人建立正向關係，具有最大的預測力。情緒優勢對心理幸福的自主性的解釋變異量貢獻最大，而智力優勢則是心理幸福的個人成長的最強預測變項。克制優勢對心理病理症狀的整體嚴重性指數有最大的預測力（負向關係）。Niemiec（2023）分析性格優勢在心理健康中的雙重角色，即性格優勢不僅能促進幸福感，還能減少痛苦。該研究蒐集了 12,050 人的自陳質性報告樣本，探討性格優勢在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和社會健康這三個領域的作用。分析結果顯示 24 項性格優勢都在一定程度上對健康有益，其中某些性格優勢表現出普遍效應，在多個領域中展現出強烈的影響力，例如愛、洞察力、善良、希望、幽默和好奇心。其他性格優勢則展現了特定效應，在某一領域中展現出強烈的影響力，例如，堅毅和自律對身體健康的影響，靈性和社交智慧對社會健康的影響，創造力對心理健康的影響。

需要澄清的是，「美德」一詞在此系統之意涵並不同於「道德」，而是源自古希臘字 *arête*，意指「與角色有關的卓越性質」，或可泛稱為「人的卓越特性」。此概念承襲亞里斯多德哲學的宇宙觀，亦即相信任何事物皆有其存在的目的，而能實現自身目的之特性即可視為是卓越或美德。此系統之核心美德也涉及比道德更廣泛的內容，包含了無關道德的成分。更清楚地說，所謂核心美德的意涵更接近幸福的構成要素。例如，比較上述核心美德（Peterson & Seligman, 2004）與心理幸福（Ryff, 1989）的各項構面，可以發現兩者之間有許多相互對應之處：超越性美德對應生活意義；智慧與知識、勇氣、節制這三項美德對應環境掌控、個人成長和自主；仁慈、正義這兩項美德對應自我接納和正向人際關係。本文認為上述對應關係反映了美德觀取向的基本立場：美德構成了幸福。換言之，從哲學概念分析的角度而言，兩者可能是構成性關係（constitutive relationship）。當前的心理學研究結果也顯示：相較於主觀幸福，性格優勢與心理幸福的關聯更高（Hausler et al., 2017）。

2. 幸福理論研究典範的反思與疑難

本文認為美德觀取向的幸福理論在探討德福關係時，有幾點不足之處。首先，美德觀取向建立在德行倫理學的哲學基礎上，具有特定的規範倫理學立場，預設「德福一致」的觀點，因此難以探討其他方向的德福觀。其次，美德觀取向中的「美德」，作為德行倫理學或性格優勢的核心概念，其意涵並不完全等同於「道德」，而是廣泛地指涉各種範疇的卓越屬性。更清楚地說，在美德觀幸福理論中，「美德」的意涵更接近「幸福」，也就是構成幸福的必要成分。如此一來，在實徵研究上，性格優勢與幸福感呈現高度正相關，其實是可預期的結果。再者，美德幸福觀的研究雖然描述了部分存在的德福一致現象，但沒有探討人們如何解釋德福關係，包含對一致和不一致現象的解釋。其四，美德幸福觀以某些規範性標準來定義幸福，但卻難以提出一項共通的標準來衡量理論的歧異。

相較於美德幸福觀，享樂幸福觀取向沒有預設特定的德福關係立場，但也因此需要提出理論來解釋道德行為與主觀幸福的不穩定關係，例如：有理論認為某些利他行為屬於病態利他（pathological altruism），反而可能降低主觀幸福感（Kaufman & Jauk, 2020; Oakley, 2013; Oakley et al., 2011），或者反社會人格或心理病態者可能藉由引起他人恐懼而獲得愉悅感（Book et al., 2020; Marsh, 2019）。

最後，雖然美德觀幸福與享樂觀幸福在實徵資料中經常呈現高相關，但兩者的關係並不穩定一致。Huta 與 Waterman（2014）的文獻回顧發現，聚焦在人格特質（traits）層面時，兩者的相關係數的範圍介於 0 至 .6 之間，而聚焦在情境狀態（states）層面時，兩者的相關性變化更大，介於 -.3 到 .8 之間。Joshanloo（2019）使用來自美國中年人研究計畫（Midlife in the United States）的 3 波調查數據（間隔 10 年，跨距 20 年， $N = 2,731$ ），以交叉滯後面板分析方法（cross-lagged panel analysis），分析主觀幸福和心理幸福在 20 年間的變化關係。結果顯示，自迴歸效應較大，表明主觀幸福和心理幸福都有相當的時間穩定性，然而，心理幸福的穩定性高於主觀幸福。心理幸福對主觀幸福的預測效果更強且一致，反之，主觀幸福對心理幸福的預測則不一致和不穩定（正向、負向或不顯著）。總結而言，Joshanloo 認為心理幸福比主觀幸福更能穩定地預測未來的整體幸福水準。本文認為，享樂幸福觀和美德幸福觀的相關性不穩定一致，恰好反映兩者之間可能存在著調節機制，而德福觀可能是調節兩者關係的因素。

(二) 正義信念研究典範之回顧

1. 正義信念的德福關係

廣義而言，正義信念包含公正世界信念（belief in a just world），以及神祇與業報（karma）信仰等超自然信念。這些信念都涉及「公平互動」的概念：對那些幫助自己的人回報以友善、誠實與合作，或將好處分配給那些應得的人。相對地，對違犯道德行為的人則迴避或報以懲罰。這類信念體現於許多社會互動，無論是幼兒展現出的直覺偏好，或是不同文化所贊同的道德觀念等（White & Norenzayan, 2019）。綜合而言，上述各項信念最終都導向「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德福一致關係。

「公正世界信念」是指人們傾向相信世界是公平的，行為與報應之間存在著公平的對應關係。廣義而言，此信念涵蓋了道德（例如善惡有報）與非道德（例如皇天不負苦心人）層面（Lerner, 1980）。公正世界信念具有適應性功能，讓人們維持世界是穩定有序的認知，而能夠投入長期計畫和動機。當此信念受到威脅時，人們會需要採取某種認知解釋來修復此信念，例如：當參與者感覺無能為力幫助受害者時，會責怪無辜的受害者是自食惡果。相反地，參與者會過度賦予成功者更多的正向特質，即使他們知道該成功完全是幸運的結果（Lerner, 1980; Montada & Lerner, 1998）。

有些研究者認為公正世界信念可以再分為兩類，一類是「普遍的公正世界信念」（general belief in a just world）或「對他人的公正世界信念」（the belief that the world is just for others）；另一類是「個人的公正世界信念」（personal belief in a just world）或「對自我的公正世界信念」（the belief that the world is just for the self）。前者關注的是抽象的一般大眾或是自我以外的其他人，後者則關注自身（Dalbert, 1999; Lipkus et al., 1996）。Dalbert（1999）的研究支持兩因素的公正世界信念理論，主成分分析結果顯示，13 題總量表（採 6 點 Likert 量表）可以區分為兩因素，兩因素總共可以解釋 45.5% 的變異，個人的公正世界信念由 7 題組成（例題如：「我相信我通常會得到我應得的。」），因素負荷量介於 .43 ~ .82，內部一致性 α 係數 = .82；普遍的公正世界信念由 6 題組成（例題如：「我相信大致上人們會得到他們應得的。」），因素負荷量介於 .44 ~ .71，內部一致性 α 係數 = .68，兩因素有顯著相關（ $r = .37, p < .001$ ），且人們在個人公正世界信念的傾向更高。其他研究發現此兩類公正世界信念有高度正相關，但有不同的影響作用。例如：個人的、對自我的公正世界信念正向關聯主觀幸福感、生活滿意度、親社會行為，且負向關聯於反社會行為；普遍的、對他人的公正世界信念則正向關聯於責難或貶損無辜不幸的受害者、對冒犯者的懲罰反應，以及對弱勢團體的嚴苛態度。儘管如此，整體公正世界信念仍與主觀幸福、心理幸福、利他行為、復原力都有正向關聯，而與憂鬱症狀有負相關（Bartholomaeus & Strelan, 2019; Hafer et al., 2020; Sutton et al., 2017）。

另一方面，超自然的正義信念是指：相信神祇或其他超自然力量會干涉人類事務之不幸或幸福，維護世界的公正和秩序。超自然信念包含兩類主流信念：神祇信仰（belief in God）和業報信仰（belief in Karma）。兩者的關鍵區別在於，是否將超自然力量視為具有位格（亦即具有擬人的性格甚至形象的神祇），或是不具人格的抽象力量（White et al., 2021）。

針對神祇信仰，一些研究發現，當情境促發具道德化（moralizing）或主體性（agentic）的神祇形象，會提升人們的利社會或道德行為、促進團體間的合作、降低內團體偏私，對違犯道德的判斷也較嚴格。而且當人們所認知的神越嚴厲，效果就越強（Lang et al., 2019; Norenzayan, 2013; Purzycki et al., 2016; Shariff & Norenzayan, 2011; Shariff et al., 2016）。可能的心理機制解釋是，此時人們將神視為社會主體（social agent），正在監視個體的道德行為，並會懲罰違反道德規範的行為。因此在缺乏人類監視的情況下，也會對心理和行為產生影響（Bering & Johnson, 2005; Johnson & Bering, 2006; Norenzayan et al., 2016）。

業報信仰是將公平正義視為超自然的機制，認為行為會導致「德福一致」的後果，而且相信此機制可跨越不同生命形式（亦即相信轉生輪迴等信念）。此類信仰是許多世界宗教的核心信念。業報信仰通常認為，即使行動與結果之間的因果聯繫不明確，業報機制仍然運作。甚至相信：德福一致的結果不僅取決於他人對過去道德行為的察覺，而且即使在缺乏物理因、生物因、第二或第三方懲罰，以及直接或間接的互惠情況下，經驗後果仍可以歸因於過去的道德行為。業報常被認為可以

在無限長的時間尺度上運作，包括無盡的轉生輪迴。因此業報可以用來解釋許多現象，包括：個人受他人對待的方式、非由人類行動引起的不幸遭遇（包括疾病、事故和自然災害等），以及個人出生時的地位、財富和健康狀況等（White et al., 2019）。

White 等人（2019）的研究顯示，業報信仰揉合了道德、因果關係和轉生輪迴三種元素，並且存在四種心理模式：（1）擬人化業報：將業報來源視為類似人格神的主體，如同神祇信念連結到第三方監視者；（2）業報作為行為特徵：將業報作為個人的精神和行為特徵，可以被辨識和產生影響力；（3）業報作為資源：它可以累積、記錄和交換以獲得特定的結果；（4）業報作為抽象原則：將業報視為世界法則，不需要假設超自然的主體力量作為中介，即能形成因果力量。綜合而言，White 與 Norenzayan（2019）回顧指出業報信念的研究重點在於探討哪種模式最能描述人們對於業報的思考方式，以及不同的文化群體、個人或情境是否傾向特定的業報心理模式。不同的業報心理模式也可能具有不同的效應，例如：相信擬人化業報者，可能也更相信惡業是可以被寬恕赦免的；相信業報可作為資源者，則雖然認為惡業不可以被寬恕赦免，但可以透過相應善行補償抵銷。

已有一些研究探討業報信念的行為效果。White 等人（2019）的研究顯示思考神祇和業報都會增加慷慨行為。此外，思考業報在不同宗教群體（包含基督教徒、印度教徒、佛教徒、無宗教信仰者）中都增加了慷慨行為，表示業報信念的影響似乎是跨宗教的。

關於超自然正義信念的普遍性、跨文化性有兩種心理基礎的解釋：認知副產品（cognitive by-products）解釋和動機性解釋。認知副產品解釋的核心論點是超自然正義信念根植於進化形成的認知傾向，雖然這些認知傾向並非特定的宗教思想，但有助於接受超自然正義信念。例如，心智化（mentalizing）、目的論思考（teleological thinking）、身心二元論（mind-body dualism）。動機性解釋認為超自然正義信念的普遍性是因為這些信念滿足了人們對於將世界視為可理解、有序、可控且有意義的根本動機，從而減少了不確定性並增加控制感，進而減輕焦慮並鼓勵追求長期目標（White & Norenzayan, 2019; White et al., 2021）。

本土心理學也有關於業報信念的研究。蔡明昌（2018）整理華人文化的果報思想（主要是佛教和道教），並建構果報信念量表，內容包含七個層面：現世報應、死後報應、子孫承負、功過相抵、宗教救贖、接受命運（個人命運已由業報決定而無法改變）與創造命運（個人命運可以由善惡行為改變）。根據該量表調查顯示，臺灣的大學生對於果報信念的各個層面並非十分堅信，但稍傾向相信現世報應、死後報應、子孫承負以及創造命運的觀念，而對於功過相抵、宗教救贖和接受命運則傾向不相信。

2. 正義信念研究典範的反思與疑難

整體而言，正義信念的研究雖然可以部份描述德福關係信念，但亦存在不足之處。首先，公正世界信念雖然描述了應報相稱的素樸觀念，但一方面對於德福關係的思考過於簡化，未能進一步探討兩者的各種可能關聯；另一方面，「付出和回報相稱」的意涵比「德福一致」還寬泛，指涉範圍包含非關道德的範疇（例如，工作報酬、人際情感等）。超自然正義信念（包含神祇和業報信仰）則聚焦在透過超自然機制解釋和支持「德福一致」，因此側重描述超自然機制本身的性質，而並非德福關係的內涵。例如，神祇信仰將神祇視為具位格、全知、全能、道德化、一神或多神、嚴厲或寬容等屬性；業報信仰則著重於思考業報的運作方式，例如轉生輪迴、功過相抵等，但關於德福關係的描述常常僅是「善惡終有報」的籠統概念。

其次，正義信念僅只著重「正義」或「公平」之道德認知面向。然而無論在倫理學或道德心理學中，「公平正義」的觀念只是道德認知的一部分，並非涵蓋全部的道德思考與實踐（Haidt, 2007, 2012; Shweder et al., 1997）。例如，Haidt（2007, 2012）的道德基礎理論（moral foundation theory）指出，人類具有多種道德心理基礎，包括關愛（care）、公平（fairness）、合群（community）等。這些道德基礎可經過不同的社會文化和個體條件塑造，形成多元的道德系統與文化差異。其中「公平」可以視為正義信念的心理基礎，但其他道德基礎與正義信念的關聯就較間接或薄弱。因此，本文認為正義信念雖然探討了一部分德福觀，但仍未能捕捉德福關係的多元和細膩之處。以「關愛」基礎為例，幫助受難者脫離痛苦所產生的快樂，就很難用正義信念來描述，需要更精緻的德福觀概念架構才能涵蓋相關心理現象。

再者，日常經驗和哲學思想常將道德視為與平靜、和諧、滿足等內在精神幸福狀態有關。由於

正義信念關注於外在行為和回報之間的公平相稱，常未能顧及相關的德福觀面向。

德福論哲學的梳理分析

綜上所述，現行探討德福關係的心理學研究取向，對於德福關係存在特定立場、界定過度簡化或過度寬泛，故多未能清楚完善地描述和解釋人們可能抱持的多元德福觀。從道德心理學的「多重行動理路」和「雙重歷程模式」來看（陳舜文、邱振訓，2011；葉啟政，2000），人們在日常生活中透過心理自動歷程形成的德福觀「實作理路」與「論述理路」，常源於倫理學或德福論哲學的「結構理路」。因此，本文接下來將回顧有關德福關係的倫理學論述，梳理分析各種德福關係之意涵，據以建構較完整的「多向度德福觀」心理構念模式。

（一）德福論哲學的梳理

針對德福關係，Mieth（2017）指出「道德」和「幸福」在邏輯上可以形成四種關係命題：同一（identity）、一致（harmony）、獨立（dissonance）和互斥（incompatibility）。而如何界定「道德」和「幸福」的內涵，可能導致構成關係命題的差異。以下依照四種關係命題分析統整德福論哲學的各家觀點。

1. 同一關係

同一關係或德福同一論直接將道德視為幸福。換言之，實踐道德即是實現幸福，並且認為唯此才是真正的幸福，兩者一體不分（Mieth, 2017）。典型的同一論，在西方思想中有斯多葛主義（Stoicism），而中國的道家、印度的耆那教（Jainism）和佛教也蘊含類似的思想。德福同一論可以再區分為兩種觀點：禁欲論（asceticism）和超越二元論（nondualism）。禁欲論認為真正的幸福是源自精神而非物質，道德實踐是讓人的精神從物質欲望中解脫出來，達致不假外求的精神幸福。禁欲論由精神幸福的實現來界定道德，認為人不僅可以透過禁欲實現幸福，還應該這麼做。例如：斯多葛主義主張以遵從自然理性（logos）的德行，達到澹泊寧靜、無欲則剛，不受身外苦樂影響的心靈幸福（McMahon, 2006）；耆那教主張精神受到了物質的束縛而受苦，唯有透過嚴厲限制物欲的苦行才能讓精神獲得解脫，得到精神本具的快樂（釋印順，1988）。

超越論與禁欲論不同之處則在於強調超越苦樂二元，認為追求「趨樂避苦」本身就是痛苦的根源，人唯有體認到苦樂是相依的一體兩面，是主觀意識的妄想幻覺，乃至放下趨樂避苦的心態，不逃避痛苦也不追求快樂，才能獲得真正的心靈平靜，這才是真正的幸福。佛教中的「涅槃」（nirvana），即是達致超越苦樂二元的寂靜終極境界（釋印順，1988；Joshnloo, 2014；Lama, 2014；Ricard, 2014）。正如《雜阿含經》所言：「貪欲永盡，瞋恚永盡，愚癡永盡，一切諸煩惱永盡，是名涅槃」。此外，道家以自然為核心理念，批判和反思屬於人為的德（規範倫常）與福（名利康壽）。道家思想認為，善惡禍福都是自然運轉的環節。人之所為所求，則是徒勞無功，甚至適得其反。故此，道家主張之德是順應「道」（即自然）而無為無求。所謂「修德」即是將所思、所感、所為與自然之道相符應，體認身外之禍福乃是完整的自然之道，平等看待，從而達致心靈的寧靜（林佩儒，2010；施依吾，2011；韋政通，2012）。正如《莊子》所言：「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以及「與天和者，謂之天樂」。

2. 一致關係

德福一致關係是相信「實現幸福」的行動與「實踐道德」的行動是一致的。德福一致論認為「道德」與「幸福」的內涵並非同一，但兩者並行不悖。許多倫理學思想都採取一致關係的立場，本文整理了五種主要論點：業報論（doctrine of karma）、神恩論（doctrine of God's grace）、家族論（doctrine of clan）、德行機運論（doctrine of virtue on fortune）與幸福階層論（doctrine of happiness-hierarchy）。這些論點並非互斥，中西方各種哲學思想常同時包含多種論點。

業報論源自印度思想，印度宗教普遍都有「業報」的概念，亦即任何行為都一定有相符應的後

果，反之任何事件也都一定有相應的行為原因。簡言之，業報論相信善惡因果報應絲毫不爽，有時不是不報，只是時候未到。有情眾生（包含所有型態的生命）的行為必然遵循因果業報的法則，結合轉生輪迴的世界觀，則可以解釋現世中德福不一致的現象（張俊，2004）。神恩論則相信幸福的來源是全知全能的神或上帝，實踐道德的人將必然受到神的賜福，即使在現世受盡苦難，在永生的來世也將會獲得終極的福樂（張俊，2004；McMahon, 2004, 2006）。一神論宗教思想為典型的神恩論。神恩論通常也會將道德的來源歸於神，從而以遵從神的意旨所定義的道德觀念。如前所述，業報或神恩論的宗教或哲學思想，常與人們抱持的超自然正義信念有關。

家族論將善惡報應的主體從個體轉移到家族，個體的道德行為並不只是在自己身上產生結果，也會傳遞到家族成員和後代子孫。儒家和道教思想都帶有家族論觀念。儒家將「福份」分為兩種：心性之福和身外之福。「心性之福」操之在己，有德者必享之；「身外之福」操之在命，有德者配享之，但必須依天命安排而定。天命雖難測，但天理自有公道，福報不必在己身，而可以在家族和後代（林佩儒，2010；蔡家和，2007）。如《左傳》所言：「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易經》亦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道教的「承負」信仰相信行善者澤被子孫，行惡者流毒後代，同時再提出「解承負」之說，透過道法儀式或殊勝善功可以解除所承負之先人之厄（張俊，2004）。

德行機運論的核心觀點是修養心性德行必然會帶來心靈的幸福，但在這種必然性之外，仍存在其他類型幸福受到機運所影響。古希臘哲學中的智性論（intellectualism）、德行論和享樂論，以及中國儒家思想都帶有此觀點。蘇格拉底（Socrates, 470–399 B.C.）與柏拉圖（Plato, 429–347 B.C.）的智性論主張，幸福可以透過智性的心靈和生活獲得。柏拉圖在《理想國》中論證道德的善是「內在善」（intrinsic good），具有內在價值，因為道德讓人的靈魂達致和諧的狀態，亦即用理性統御了激情和欲望。因此，德行是透過心性的修養（用理性駕馭意志和欲望）所達成的，而心靈的和諧本身就是幸福（McMahon, 2004, 2006）。亞里斯多德的德行論主張「至福」（eudaimonia）是人一切行動的目的，也就是實現至善的人生。人的最高價值是理性，包括理論理性和實踐理性。德行即是理性的展現。亞里斯多德認為，至福需要包含外在善（例如：出身背景、朋友、榮譽、財富等）和內在善（例如：靈魂與肉體的德行、美好、樂趣等）。外在善的獲得除了具備德行之外，仍需要命運的眷顧。因此德行的具備與否，仍受到機運影響。但大體而言，只要追求德行的能力沒有缺陷，任何人都可以透過修養德行，獲致一定程度的幸福（鄔昆如，2007；McMahon, 2004, 2006）。相較於亞氏至福論所企望的人生至善，伊比鳩魯學派的享樂論則將幸福界定為感官的愉悅感受，但同樣強調明智享樂，也就是運用理性節制欲望，才能有效的趨樂避苦，達到身心的安適寧靜（McMahon, 2004, 2006）。如前文所述，當代心理學中的美德幸福觀與享樂幸福觀，分別呼應了西方哲學中的德行論與享樂論。

東方的儒家思想則結合心性修養的人文精神、上天賞罰善惡的原始信仰，以及血緣宗族社會的集體主義。如前文提及，儒家將福份分為「心性之福」和「身外之福」。心性之福是修養德行所致，具有必然的確定性。而身外之福，則包含了不確定性。儒家思想一方面相信天理自有公道，有德必將有福。但另一方面也認為天命難測不可強求，身外之福的回報時間和對象（個人或家族）是不明確的。如此一來，整合了對心性之福的自得自足、對天命的樂觀謙遜，形成「樂天知命、修身俟命」的德福一致觀（林佩儒，2010；蔡家和，2007）。正如《論語》云：「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孟子》亦云：「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最後，幸福階層論則認為幸福有高低階層之分，人們一旦體驗兩者，必然會選擇較高階的幸福。實踐道德可以帶來高階的幸福，因此即使有時候實踐道德會需要犧牲某些幸福，但若是犧牲低階幸福換取高階幸福，仍然可以提升整體幸福。進一步而言，人們若犧牲個體幸福以謀取集體幸福，可獲致更高的幸福。規範倫理學中的效益論（utilitarianism）便是如此解決個體幸福與集體幸福的衝突（McMahon, 2004, 2006）。

3. 獨立關係

獨立關係認為道德與幸福是獨立的兩種價值，兩者不必然和諧一致，而當兩者衝突時，道德價

值應該優先於幸福價值 (Mieth, 2017)。此觀點可以追溯至古希臘悲劇作品蘊含的悲劇世界觀和宿命論，亦即認為苦難普遍存在，幸福超出人所掌握，人只能受命運和神祇的隨興支配。因此道德與幸福是相互獨立的，甚至有時會出現對立 (McMahon, 2006)。採取獨立關係立場的典型代表是哲學家康德 (Immanuel Kant, 1724–1804) 提出的義務論 (deontology)。康德主張道德的唯一來源是理性，理性可以推導出具有普遍性的道德原則。更清楚地說，道德的強制性來自理性，而非外在的制裁者 (如上帝、因果報應、社會群體等)。人作為理性的存有者，必須受理性約束，行動必須無條件遵從理性。於是，人成為道德的立法者和遵從者，構成自律的道德體系。在此觀點下，道德與幸福也是彼此獨立的，幸福不是也不應是證成道德的條件，甚至當在完全不考量道德行為帶來的幸福時，才更彰顯善的純粹。儘管如此，康德也認為至善 (supreme good) 應該是道德和幸福的合一，但只有在自由意志、上帝存在、靈魂不朽三項前提成立之下，才可能達成至善 (McMahon, 2004, 2006)。

4. 互斥關係

互斥關係的典型立場，就是哲學家尼采 (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 提出的「權力意志」 (will to power) 觀念 (Mieth, 2017)。此觀念認為道德與幸福必然衝突且無法解決，道德要求導致人的壓抑和自我異化 (self-alienating)。幸福是個人意志的自由實現，而道德則是對個人意志的壓制，兩者本質上是相互排斥的。只有在個人意志與道德規範一致時，才可能避免兩者的衝突。這有兩種可能，一是個人意志恰好與道德規範一致，二是個人意志有權力制定道德規範 (Mieth, 2017)。互斥關係與獨立關係的關鍵差異在於，前者並未視道德優先於幸福，甚至認為某些時候追求幸福應該優先於遵從道德。

(二) 德福論哲學的結構分析

根據上述對於德福論哲學諸多觀點論述之梳理，以下進一步分析這些論述中所蘊含的心理意涵或結構。首先，道德與幸福之間的四種關係形式在邏輯上相當周延，也分別有相應的思想論述。若根據四種關係形式中，道德與幸福的「調和性」 (congruence) 為判準，將各關係形式置於一個連續向度，調和程度由高至低分別為同一、一致、獨立和互斥。這樣可以更清楚描述德福關係的形式差異。

其次，進一步分析「調和向度」兩端的論述，可以發現高調和的論述傾向區分「內在幸福」與「外在幸福」，以主張德福一致或調和。綜合各家觀點，「內在幸福」可界定為：不需要依附特定的物理和環境條件的幸福狀態或特質，例如，平靜、安定、和諧、喜悅、快樂、無憂慮等內在主觀經驗 (internal subjective experiences)。相對地，「外在幸福」可界定為：需要依附特定的物理和環境條件的幸福處境 (situation)，例如，財富、地位、健康、好運、成功、保佑等外在客觀存有事物 (external objective things)。根據這兩種幸福類型，可以發現調和德福關係所訴諸的論述也可以區分為內在和外在外，前者相信道德與幸福在內在經驗達成調和，也就是道德和內在幸福一致，後者則相信道德與幸福在外在世界達成調和，也就是道德和外在外幸福一致，但兩者並不互斥。在高調和端的德福論哲學透過區分內外幸福，解釋不同的德福調和機制：道德與內在幸福的關係可以用心靈和諧來解釋，而與外在幸福的關係則存在機運的或然性，或是依靠家族承負、業報輪迴、末日審判等超自然力來實現最終的調和。

另一方面，低度調和的德福關係論述，則傾向區分積極和消極的道德義務及相應結果。所謂「積極義務」 (positive duties) 泛指鼓勵勸導人們採取「作為」 (行善) 的道德指引。此類義務通常可考量具體時空條件，來判斷是否採取行動，允許有例外，不具強制性。相對地，「消極義務」 (negative duties) 則是要求人們「不作為」 (不作惡) 的道德規範。此類義務通常在任何時空條件下都應當遵守 (在不跟其他義務衝突的情況下)，不允許有例外，具有強制性。在結果方面，違反「消極義務」往往會被社會大眾視為罪惡而受到譴責或懲罰，但未實踐「積極義務」通常則只會被視為缺乏美德；反之，遵守「消極義務」通常不會受到特別肯定，實踐「積極義務」則常會獲得讚揚尊敬 (Gert, 1973; Hwang, 1998)。

基於「積極義務」和「消極義務」的規範強度差異和行為結果的不對稱，區分兩者有助於論述「德福不一致」的合理性。依據康德倫理學的理路，個人無論樂意與否都應該遵守道德律令。換言之，即使感到痛苦仍需要奉行消極義務。相對地，個人可以依照意願喜好決定是否履行積極義務，從而使其行善與幸福達成一致。綜言之，消極不做惡（遵守消極義務）未必有善報，積極為惡（違犯消極義務）大多有惡報；消極未行善（不履行積極義務）未必有惡報，積極行善（履行積極義務）大多有善報。尼采哲學將道德視為對意志的壓迫，也是著眼於消極義務的德福衝突，而認為積極義務可以由意志支配，可能可以達成德福一致。除了上述倫理學的思考推論，善惡報應的不對稱性也有心理學基礎。許多研究顯示人們在看待得失時具有負向偏誤（negativity bias）和損失嫌惡（loss aversion）現象：對痛苦經驗的敏感度和學習效率高於愉悅經驗，而對損失的敏感度高於獲得（Ito et al., 1998; Kahneman & Tversky, 1979; Novemsky & Kahneman, 2005; Rozin & Royzman, 2001; Sokol-Hessner & Rutledge, 2019; Vaish et al., 2008）。關於行為動機的研究也多發現，人們的行事動機常可以分為趨近（approach）和遠離（avoidance），或促進（promotion）和預防（prevention）兩種方向（Förster et al., 1998; Higgins, 1997; Higgins et al., 1994）。在一般大眾心中，遵守消極義務的動機很可能多是為了避免惡害，並非為了追求提升幸福。相對地，採行積極義務的動機則大多期待獲得回報或讚賞，包含自我讚賞等。

綜合上述分析，本文認為若以調和向度為主軸，並區分「幸福類型」（內在對外在）、「道德類型」（積極對消極）兩組基本概念，即可構成德福論哲學的主要概念架構。其中，高度調和的論述著重內在和外在幸福的區分，低度調和的論述則著重積極和消極義務的區分。整體架構參見表 3。

表 3
德福論哲學之概念架構

	高度德福調和論		低度德福調和論	
	同一	一致	獨立	互斥
幸福類型： 內在／外在	區辨		無區辨	
道德類型： 積極／消極	無區辨		區辨	

德福觀的心理構念模式

根據「多重行動理路」和「雙重歷程模式」之觀點（陳舜文、邱振訓，2011；葉啟政，2000），在日常生活中，個體很可能在實作和論述時，部分援引或組合德福論哲學中的觀點，形成對於道德與幸福之關聯的看法。換言之，人們可能會擷取德福論哲學架構中的各項概念，建構為特定之心理構念。根據德福論概念架構，最上層的概念是「調和程度」，亦即相信道德與幸福可調和的程度，中層是「內在／外在」和「積極／消極」兩組概念，如此可形成四項基本構念：內在調和、外在調和、積極調和，以及消極調和。此四構念可再交叉組合成四類複合信念：內在積極調和、內在消極調和、外在積極調和，以及外在消極調和，進而形成「多向度德福觀」之心理構念模式，請參見表 4 之架構及定義。

表 4
「多向度德福觀」心理構念模式

多向度德福觀		
幸福類型	內在調和：	外在調和：
道德類型	相信道德與內在幸福的調和程度	相信道德與外在幸福的調和程度
積極調和：	內在積極調和：	外在積極調和：
相信行善增進幸福的程度	相信行善增進內在幸福的程度	相信行善增進外在幸福的程度
消極調和：	內在消極調和：	外在消極調和：
相信作惡損害幸福的程度	相信作惡損害內在幸福的程度	相信作惡損害外在幸福的程度

我們可以進一步依照「多向度德福觀」心理構念模式發展自陳量表。考量題目的明確性和簡約性，我們認為應該以四類複合信念作為題目設計的架構，分別設計四個分量表，題目設計將緊扣道德行為（和不道德行為）或有道德者（和不道德者）與內外幸福損益之間的因果關係敘述，例題如表 5。進一步推論測量的潛在變數結構，我們認為四因素模型、幸福類型二階模型及道德類型二階模型的因素結構都有可能，三種模型的適配度需要進一步研究檢驗，三種模型的因素結構圖分別如圖 1、圖 2、圖 3。三種模型的適配度檢驗的理論意義在於進一步了解德福觀的心理結構，四因素模型意味著幸福類型和道德類型對於德福觀的重要性相當，幸福類型二階模型意味著幸福類型對德福觀的重要性比道德類型高，道德類型二階模型意味著道德類型對德福觀的重要性比幸福類型高。此外，無論哪一種模型有最佳適配度，我們仍然可以依照概念意義將四個分量表的分數兩兩組合成「內在」、「外在」和「積極」、「消極」共四個量尺分數，進行研究推論與應用。

表 5
多向度德福觀量表例題

四類複合信念	例題
內在積極調和	有品德的人會獲得心靈和諧。
內在消極調和	違背道德行事會讓人時常煩惱。
外在積極調和	依從良心做事最後一定會成功。
外在消極調和	作惡多端會遭受厄運。

圖 1
四因素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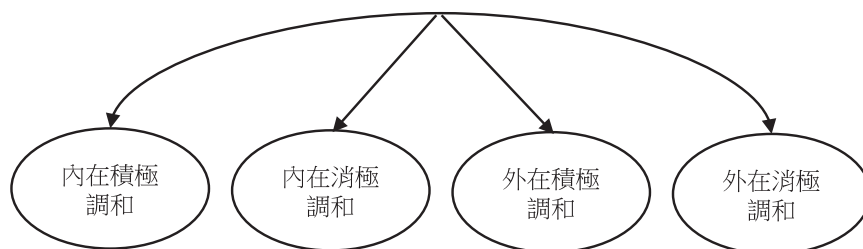


圖 2
幸福類型二階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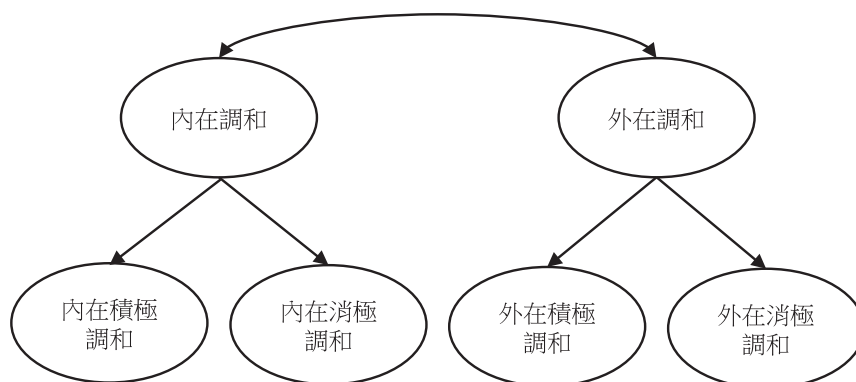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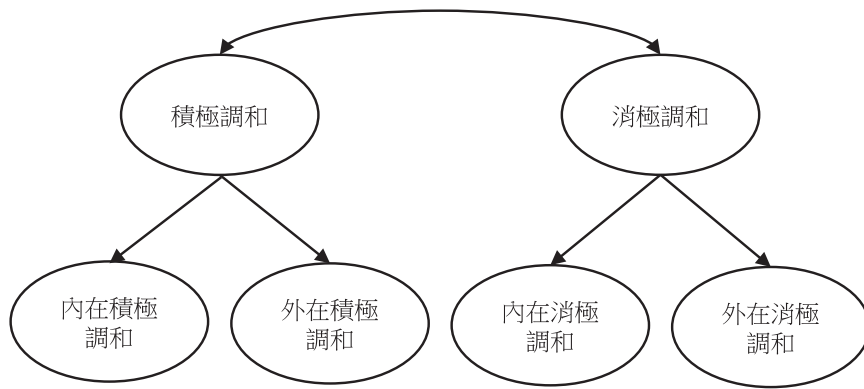


圖 3
道德類型二階模型



德福觀心理構念模式的進階推論

我們認為「多向度德福觀」心理構念模式不但可以補充既存理論之不足，可解釋更豐富的心理行為現象，也能做為實務應用之參考。以下分別用三項議題為例進行說明，展示德福觀在理論和實務上的應用。此外，我們也進一步提出德福觀與數個心理或行為變項的關係推論，作為後續實徵研究檢驗效標關聯效度的理論基礎。

(一) 德福觀調節享樂觀幸福和美德觀幸福的關係

如前文所提及，在幸福理論研究典範中，美德幸福觀與享樂幸福觀的相關性並未有穩定結果。一些研究者認為需要更清楚的概念分類系統，來界定和測量幸福 (Huta & Waterman, 2014)。另有一些研究者認為，兩種幸福觀研究取向具有本質上的差異：享樂觀的研究是在實然的立場，試圖探討愉悅感和正向情緒的心理機制；美德觀則多從應然的立場，提出美好生活的建議 (Bok, 2010; Disabato et al., 2016; Tiberius & Plakias, 2010)。然而，從「實然」論述到「應然」會面臨一項挑戰，亦即對幸福的解釋和主觀經驗之間可能存在差異，此差異需要外在客觀的標準，方能使幸福從主觀經驗轉變成客觀事實，但這卻有悖於常識和直覺。即使將「幸福」視為客觀事實，也會面臨對標準之權威性和武斷性的質疑 (Tiberius & Plakias, 2010)。簡言之，享樂觀雖然將「幸福」的意義局限為愉悅感和正向情緒，但意義上具有多樣和變異性，亦即可能存在多種讓人感到愉悅和正向情緒的生活方式。美德觀嘗試提出良善的幸福圖像和生活方式，強調可持續培養美德以構築美好的人生，但卻難以論證哪種價值觀組合才是最佳幸福或才算是幸福，因而可能陷入價值觀衝突的難解爭論。

本文認為，從理論和實徵結果來看，享樂幸福觀和美德幸福觀分屬不同的範疇，在概念上並無交集，前者屬於經驗，後者則屬於行動，兩者之間的相關性則存在個別差異，而本文提出的「德福觀」可能是兩者之間的重要調節變項。更清楚地說，由於美德與道德有交集，培養美德經常伴隨履行道德，當個體傾向相信「德福一致」時，將認為履行道德會導致好報，從而促進主觀幸福，增強美德幸福與享樂幸福之間的關係。反之，當個體傾向相信「德福不一致」時，將認為履行道德不一定會有好報，從而減弱美德幸福與享樂幸福之間的關係。

(二) 以多向度德福觀統合多重道德動機面向

許多道德心理學的研究顯示，人們的道德動機牽涉道德情緒 (moral emotion)、道德推理 (moral reasoning)、道德認同 (moral identity) 等多重面向。這些動機面向究竟是以何種方式彼此作用、組織和互動，則存在著爭論 (李琪明, 2020; Batson, 2008; Blasi, 1999; Curren & Ryan, 2020;

Hardy, 2006; Hardy & Carlo, 2005; Kaplan, 2017; Krettenauer, 2011, 2020; Krettenauer & Stichter, 2023; Krettenauer & Victor, 2017; Nunner-Winkler, 2007; Schroeder et al., 2010)。

有一些研究和理論試圖區分不同性質的動機。例如，「自我決定理論」區分外在和內在動機 (Deci & Ryan, 2000)，呼應工具價值和內在價值的概念分類。「調整焦點理論」則區分促進焦點 (promotion motivation) 和預防焦點 (prevention motivation) 兩種動機，分別導致趨近和迴避兩種行為策略 (Förster et al., 1998; Higgins, 1997; Higgins et al., 1994)。此外，也有研究者嘗試提出整合的理論架構，整合多元道德動機。例如 Kaplan (2017) 以動態發展歷程的觀點，將道德動機界定為認知和情緒的自我組織與自我調節的動態歷程。在此過程中，自我可能產生道德判斷和行動。道德認同則是道德動機長期自我組織的結果，是整合多重道德動機的頂層結構，存在發展程度和個體差異。然而，這些道德動機概念缺少一套適切的整合架構，只能運用分散的構念和量表做界定和測量 (例如：道德認同、道德情緒、道德推理都有各自的測量工具)。

本文認為，「多向度德福觀」構念模式雖然未直接界定道德動機，卻可以統整道德動機各項構念。具體推論如下：德福觀的「內在調和」信念會引發道德的內在動機，個體若傾向相信道德與內在幸福一致，將會更重視道德的內在價值。「外在調和」信念則涉及道德的外在動機，個體若傾向相信道德與外在幸福一致，將會重視道德的工具價值。再者，德福觀的「積極調和」信念涉及道德的促進焦點動機，也就是說，若個體相信善有善報，將會聚焦在促進道德完善。相對地，「消極調和」信念則涉及預防焦點動機，即相信惡有惡報，將會聚焦在預防道德缺失。此外，個體的整體德福觀調和傾向可能與道德的情緒動機有正相關，這是因為相信德福一致者更容易在道德行動中體驗到正向情緒，形成正增強。相對地，不調和傾向則可能與理性動機有正相關，這是因為相信德福獨立或互斥者，更需要依靠理性思考提供道德行動的理由。

(三) 多向度德福觀緩和公正世界信念的責難受害者效應

許多社會心理學研究顯示，公正世界信念與責難受害者 (victim blaming) 之間具有正向關係。這是因為當人們看到無辜受害者遭遇傷害時，內心的公正世界信念會受到威脅，為了維持該信念及該信念所帶來的自我安全感，人們會轉而責難受害者，視其為罪有應得 (van den Bos & Maas, 2009)。為了因應這樣的負面效應，有些研究嘗試探討可能的影響因素。例如，相較於對自我的個人公正世界信念，對他人的普遍公正世界信念與責難受害者之間具有更高的關聯 (Bartholomaeus & Strelan, 2019)。也有研究發現，自我概念建構會調節兩者間的關係，公正世界信念受到高度威脅時，獨立自我觀 (independent self) 與責難受害者呈負相關，而相依自我觀 (interdependent self) 則與責難受害者呈正相關。而且當促發相依自我觀時，相較於促發獨立自我觀，人們會產生較強的責難受害者傾向 (van Prooijen & van den Bos, 2009)。這可能因為相依自我觀會加深自我與他人的連結，使得看待他人受傷會有更強烈的自我代入感，從而導致更強烈的威脅感，最終導致更強烈的責難受害者傾向。綜合而言，上述研究都顯示：當人們傾向自我中心或具有自利偏誤 (self-serving bias)，也就是將自己視為獨特於其他人時，反而能避免公正世界信念受威脅，進而降低責難受害者效應。然而，自我中心和自利偏誤通常被視為非理性認知，提升這些非理性認知來降低責難受害者傾向，似乎不是妥善的做法。

本文認為，透過德福觀的多向度分析，推論公正世界信念對應德福觀的外在調和向度，而德福觀的「內在調和」信念則超越公正世界信念的內涵，顯示「德福一致」不一定會在外在世界達成，而可能在內在經驗達成。據此可以進一步推論，德福觀的「外在調和」信念與責難受害者傾向可能有正相關，但「內在調和」信念則可能與責難受害者傾向無相關或負相關。若上述假設成立，德福觀教育或思考可能可以提供責難受害者傾向的新解方。更清楚地說，提升人們的德福觀「內在調和」信念，更加相信「德福一致」會在內在經驗達成，有可能緩和 (負向調節) 公正世界信念與責難受害者傾向的關係。

(四) 多向度德福觀的效標關聯推論

首先，我們針對以下道德相關變項提出推論：公正世界信念、道德認同、利他、道德基礎 (moral foundation)、道德疏離 (moral disengagement)。其次，我們也針對以下幸福相關變項提出推論：

復原力 (resilience)、寬恕 (forgiveness) 和報復 (revenge)。多向度德福觀與各變項之間的相關性推論參見表 6。

1. 德福觀與公正世界信念

如前所述，公正世界信念的內涵與德福觀有所重疊，因此我們認為兩者間具有中等的正向關聯。其次，基於過去研究結果，我們推論個人的公正世界信念與「內在調和」、「積極調和」信念有正相關，普遍的公正世界信念則與「外在調和」、「消極調和」信念有正相關。再者，如前段落所推論，「外在調和」信念與責難受害者傾向應為正相關，但「內在調和」信念應該與責難受害者傾向為無相關或負相關。據此，可以進一步推論：「內在調和」信念可以調節公正世界信念與責難受害者傾向的關係。

2. 德福觀與道德認同

如前文提及，道德認同被視為重要甚至是頂層的道德動機 (Kaplan, 2017)。道德認同是與道德相關的自我認同，是由一組道德特質構成的自我概念，具有相應的社會參照 (例如真實的團體、人物，或抽象的理想形象)，從而成為個人社會自我基模的一部分 (Aquino & Reed, 2002)。Hart (2005) 認為道德認同是個體在道德相關的社會互動中的自我覺知過程。在操作型定義上，道德認同是指成為一個有道德的人在個人身分認同的重要程度 (Hardy & Carlo, 2011)。道德認同的提出主要是為了處理道德推理與道德行動之間的裂縫，即道德判斷並不能完整預測和解釋道德行動，而道德認同則可以作為推動道德行動的自我調節機制 (self-regulatory mechanisms)，是道德相關的自我一致感和連續感 (Damon, 1984)。Blasi (1983, 1993) 認為道德行動需要同時具備道德判斷和責任感兩個條件；當一個人的身分認同以道德為核心時，維持一致自我感的願望便成為其關鍵的道德動機，從而使其具備採取道德行動的責任感；因此綜合道德判斷和個人責任感 (基於其維持自我一致的身分認同) 才能更好的預測道德行動。Colby 與 Damon (1992) 認為道德認同是道德系統和自我系統的統合；並區分「高度道德的人」和「道德感與個人目標一致的人」，前者道德和自我高度統合，更重視道德本身，而非將道德視為達成個人目標的方法。Hardy 與 Carlo (2011) 認為可以運用認知基模理論來描述道德認同，例如：將道德認同視為一個特定的認知基模：成為一個有德者的心理圖像；將道德認同視為構成一個人完整社會自我基模的眾多社會身分認同之一；道德認同的運作可能涉及道德相關認知基模的組成內容及在社會情境中訊息處理的可近性。綜而言之，道德認同反映了個體的道德人格持續建構的過程，以及個體自我價值觀和社會價值觀的調和程度，是個人的自我認知基模中的重要部分，從而決定了一個人在自我知覺和表現中的道德樣貌。關於道德認同的發展歷程，Tomasello (2019) 的研究指出自我感是道德認同的基礎，而自我感的形成需要反身意識 (知道別人評價自己，並能夠自我評價)；道德認同的建立需要將自我與他人共構成更高層次的我群，並將我群視為一個客觀實體，可以理解我群的意向、目標、規範，進而以我群的觀點評價和調節自我。道德認同內化了個人所處道德社群的規範和評價，及其價值體系基礎，將其作為構成自我的重要成分。據此，個體能夠將維持社會自我的動機轉變為維持內在自我的動機，將社會自我調節轉變為規範性的自我統治，將個人性的工具性目標轉變為義務感。

在實徵研究方面，Aquino 與 Reed (2002) 的研究發展了道德認同的測量工具，並發現道德認同可以分析為兩個向度：內化 (internalization) 和象徵化 (symbolization)。內化維度連結自我，直接反映道德特質在自我的重要性；象徵化維度反映社會我，關注公共自我呈現的道德特質。他們的研究進一步顯示只有內化維度可以預測實際的利他行為。有些研究支持道德認同與道德行動有正向關聯，例如，利他行為、親社會行為、避免傷害等反社會行為、遵從倫理規範、對外團體成員的關懷……等 (Aquino & Reed, 2002; Hardy, 2006; Hertz & Krettenauer, 2016)。也有研究顯示道德認同與幸福有正向關聯，尤其是在投入 (engagement)、意義感 (meaning)、合作性 (cooperativeness) 和自我超越 (self-transcendence) 等構面 (Cui et al., 2021; Garcia et al., 2018)。

依據過去研究表明道德認同是反映道德行為的內在動機，本文認為道德認同高的人更傾向相信德福關係是一致調和，尤其是在內在幸福層面，從而推論：道德認同與整體德福觀及各分向度信念應該都呈現正相關。但我們認為各分向度應該存在中等相關，因此可以進一步以偏相關 (partial

correlation) 方法分析不同分向度的相關性貢獻，在控制「外在調和」信念之後，道德認同與「內在調和」信念的正相關應增強，反之，在控制「內在調和」信念之後，道德認同與「外在調和」信念則可能無相關聯。其次，我們推論德福觀可以中介道德認同與道德行為之間的關係，又以「內在調和」信念的中介效果最強。再者，依據過去研究表明道德認同與主觀和心理幸福存在正向關聯，本文認為道德認同高的人，會透過相信德福一致來提升主觀幸福，從而推論：整體德福觀會中介道德認同與主觀幸福感的關係。

3. 德福觀與利他

利他在定義上是指個人願意付出勞力、身體（血液、器官、其他身體組織等）、金錢、時間、知識等資源，幫助他人獲得利益或減除痛苦，且其中並未存在利益交換，在客觀上導致損己利人的結果。可以區分為兩種：心理利他（psychological altruism）和生物利他（biological altruism）。心理利他是指源自利他動機的利他行為，生物利他則指客觀上個體的行為會減少自己的生物適應性而增加其他個體的適應性，而無論個體是否具有利他動機（Vlerick, 2021）。過去的研究發現促成利他行為的動機包含親屬選擇（kin selection）、互惠（reciprocity）、聲望（reputation）、社會規範（social norm）、同理心（empathy）和相關情緒（例如：sympathy、compassion、love……等）（Kartali & Kelemen-Erdos, 2020; Lahvis, 2016; Tusche & Bas, 2021; Vlerick, 2021）。Pfattheicher 等人（2022）的文獻回顧指出研究文獻對親社會行為（prosocial behavior）和利他（altruism）的定義並不一致，導致研究結果較難比較。但是儘管定義不同，這些定義仍有共同核心：親社會行為和利他都是一種對他人有益的行為。關於定義的分歧，Pfattheicher 等人區分出三個關鍵維度：意圖和動機：行為者是否有意幫助他人；成本和效益：行為者是否會因幫助他人而付出代價；社會脈絡：行為發生在何種社會環境中。此外，不同研究對「福祉」的定義也不同，可能包括生理上的、心理上的或社會上的益處。

我們在此以利他統稱親社會或利他的態度、行為傾向和具體行為，推論整體德福觀與利他存在正向關聯。進一步以偏相關方法分析不同分向度的相關性貢獻，在控制「消極調和」信念之後，利他與「積極調和」信念的正相關增強，反之，在控制「積極調和」信念之後，利他與「消極調和」信念則可能無相關。因為「積極調和」信念更有可能促發利他動機和行為結果的正向回饋預期。此外，我們認為依據德福觀的概念內涵，推論整體德福觀中介利他與主觀幸福感之間的關係，並且「積極調和」信念的中介效果最強。

4. 德福觀與道德基礎

Haidt (2007, 2012) 與 Graham 等人 (2013) 在情緒直覺論和文化心理學的基礎上，進行跨文化的研究，提出道德基礎理論（moral foundation theory），統整出五種道德心理基礎：關愛／傷害；公平／欺騙；忠誠／背叛；權威／顛覆；聖潔／墮落。這些心理基礎是人類演化出的先天本能，並分別具有相應的情緒和演化路徑：關愛／傷害基礎的演化是為了因應照顧幼弱親人的適應性任務；讓人敏感於他人的痛苦和需求，並激發照顧受苦者的動機，鄙視厭惡殘暴的行為。公平／欺騙的演化是為了因應長期互惠合作的適應性任務；讓人敏感於合作情境和對象的善意或惡意，避開或懲罰欺騙者。忠誠／背叛基礎的演化是為了因應形成和維持聯盟關係的適應性任務；讓人敏感於他人是否具有團體認同的指標，並傾向於消除造成團體傷害或裂解的風險。權威／顛覆基礎的演化是為了因應形成大規模社會合作的適應性任務；讓人敏感於階級或地位及其相符應的行為表現。聖潔／墮落基礎的演化起初是為了因應環境衛生的風險，但後續被延伸到任何被知覺為污染象徵的客體（可能是理性或非理性的、正面或負面的、邏輯的或武斷的），讓人建立價值防衛系統，維護自我或自群體的價值感。道德心理基礎經過不同的社會文化和個體條件所塑造而形成多元的道德系統，從而可以解釋道德的文化差異。

Graham 等人 (2009) 從社會功能的角度進行分析，又將道德基礎區分為「個人化道德觀」（individualizing foundation）及「聯結式道德觀」（binding foundation）兩大類別。「個人化道德觀」包括「關懷／傷害」與「公平／欺騙」兩項道德基礎，其內涵在於將個人視為道德價值的核心理，著重於個人的權利與福祉，並且被認為是形成自由主義（liberalism）哲學傳統的直覺來源，特別強調

個人的權益。「聯結式道德觀」包括「忠誠／背叛」、「權威／顛覆」及「聖潔／墮落」三項道德基礎，其內涵在於將團體視為道德價值的核心，著重於維護現有的團體秩序，且被認為是許多保守主義（conservatism）與宗教規範的直覺來源，特別強調社群約束力、忠誠、責任以及自制（Graham et al., 2013）。

依據多向度德福觀理論，我們認為聯結式道德觀更重視道德的外在控制（他律），因此與「外在調和」信念應呈正向關聯，而個人化道德觀則更重視道德的內在控制（自律），因此與「內在調和」信念應呈正向關聯。

5. 德福觀與道德疏離

道德疏離是指個體將自己的違反道德行為與道德標準脫鉤以減輕內在衝突、自我譴責和外在懲罰的心理機制（Bandura, 1999, 2002; Bandura et al., 1996）。Bandura 等人（1996）將道德疏離分為八種機制：道德合理化：將不道德行為與有價值的目的連結；慰藉比較（palliative comparison）：將自身行為與他人更嚴重的惡行相較，降低自身行為的嚴重性；委婉標籤（euphemistic labeling）：以美化粉飾的詞彙包裝行為；忽視或曲解結果；個人責任轉置；分散個人責任；對受害者去人性化（dehumanization）；責難受害者。他們進一步編製量表測量道德疏離，並檢驗道德疏離與親社會行為、攻擊傾向、違法行為，內疚等變項之間的關係，結果發現：道德疏離透過降低親社會行為、降低預期自我譴責，並促進攻擊傾向，從而促進有害行為。此外，雖然各種道德疏離機制協同運作，但將有害行為與有價值的目的聯繫起來的道德合理化和對受害者的污名化對參與有害活動的影響力最大。

我們認為道德疏離可以作為多向度德福觀理論的負向效標。道德疏離機制主要著重減輕削弱不道德行為的良心譴責，因此整體德福觀與道德疏離應呈負向關聯，並主要是由「消極調和」信念的負向關聯所貢獻。

6. 德福觀與復原力

復原力的定義為個體在遭遇逆境時的適應能力，包含正向因應、維持良好功能、持續成長（Campbell-Sills & Stein, 2007; Connor & Davidson, 2003）。Connor 與 Davidson（2003）所編製的復原力量表經由探索性因素分析後，發現復原力的五因素結構：「個人的勝任能力、高標準和韌性」；「相信個人直覺、容忍負面的影響，以及強化因應壓力的影響」；「正向接受改變，以及安全的人際關係」；「掌控」；「靈性的影響」。沈家綺與連倬誼（2022）整理國內外的復原力理論和測驗工具，發展編製青少年復原力量表。首先以質性問卷蒐集復原力的關鍵字，歸納出六個向度：同理心態的展現；問題解決的趨向；自我情緒的調節；生活目標的確立；勝任能力的感知；正向支持的覺察。並以此六向度為架構設計量表題目，進行信效度檢驗研究，研究結果支持上述六因素結構。

復原力的理論和研究至今經歷了四波的發展。第一波發展聚焦在個人特質以及家庭、社區的保護因子。第二波發展將焦點轉移到復原力歷程（resiliency process），研究旨在闡明個人如何獲得保護因子、運作歷程中的中斷與再整合機制、個人從被中斷邁向整合的歷程。復原力被看做一個持續變化的、動態的、互動的歷程，牽動著風險機制（risk mechanisms）、保護機制（protective mechanisms）和風險環境（risk setting）。第三波發展致力探究蘊藏於個人或群體的內在動機驅力，以及創造有助於啟動與運用該驅力的經驗，進而研發各種預防性或介入性復原力方案，用以提升個人內在保護歷程以及外在資源運用。第四波發展嘗試以多元層次分析（multilevel analysis）建構復原力，包含生化機制層次、人際關係層次、家庭系統層次、社區系統層次（Bolton et al., 2017; Richardson, 2002）。

我們認為復原力理論可以補充幸福理論，解釋人在面對逆境的處境時，如何保護、回復和促進幸福。承接我們對德福觀和幸福之間關係的推論，以及過去發現公正世界信念與復原力之間的正向關聯（例如，Bartholomaeus et al., 2024; Wu et al., 2011），我們進一步推論整體德福觀與復原力應呈正向關聯。此外，我們相信兩者的相關性主要是由「內在調和」信念所貢獻，推論理路在於：當遭遇逆境時，「外在調和」信念可能導致認知失調，個體為了解決失調的衝突，會傾向相信自己是德者而能夠否極泰來，或者相信遭遇逆境代表自己的道德缺陷，前者有助於復原力，後者則有損

復原力。反之，「內在調和」信念讓外在逆境和自我道德評價脫鉤，個體更可能藉由積極調適內在狀態來維持正向自我道德評價，因此更有助於復原力。依據上述推論，以偏相關方法分析，在控制「外在調和」信念之後，復原力與「內在調和」信念的關係會增強，反之，在控制「內在調和」信念之後，復原力與「外在調和」信念的關係會減弱。此外，也可以進一步提出德福觀調節道德認同與復原力之間關係的模型，當個體對自身的道德的重視與評價高（道德認同高），並同時相信德福一致，在面對逆境時會更樂觀的相信自己可以逢凶化吉、苦盡甘來，最終能度過困境。並且「內在調和」信念的調節效果應該最強。

7. 德福觀與寬恕、報復

另一個與逆境和幸福有關的心理變項是寬恕（forgiveness）。Enright 等人（1991）定義寬恕為：「當個體遭受人際間的侵犯時，意識到自己擁有報復的權利，但卻甘願放棄，並以同理仁慈等對待傷害者。」Enright 等人（1992）進一步提出寬恕的「社會歷程模式」（social processing model），強調寬恕是發生在受害者與攻擊者人際關係互動之中，是一種認知態度的發展提昇歷程，而且是一個有效的人際問題解決策略。並將寬恕與道德認知發展進行參照，提出寬恕發展六階段，由低階到高階象徵道德推理的成熟，包括報復式、補償式、期望式、法律期望式、社會和諧式以及愛的寬恕，分別對應 Kohlberg（1976）的道德發展階段。李新民與陳蜜桃（2009）思考寬恕在西方宗教哲學及東方主體哲學的傳統內涵，認為寬恕包含寬恕他人以及尋求寬恕。寬恕他人是基於實際寬恕理論所強調的受害者對侵害者之正向心理反應，尋求寬恕則是侵害者對傷害他人的自己之正向心理反應。寬恕他人的正向心理反應是轉化生氣、憎恨、憤怒、悲傷等負向情緒，從而善待加害者。尋求寬恕的正向心理反應是轉化罪惡感、羞恥感的情緒，從而善待身為加害者的自己。李新民與陳蜜桃基於上述寬恕的概念架構，編製兩因素結構的寬恕量表，研究結果支持兩因素結構。蕭舒謙等人（2023）參考 Thompson 等人（2005）的寬恕理論及依照理論編製的「心田寬恕量表」（Heartland Forgiveness Scale, HFS），進行量表中文化的編製及信效度研究，該理論將寬恕的內涵從人際寬恕拓展到對自我和情境，將寬恕區分為三向度：寬恕自己、寬恕他人及寬恕情勢。研究結果支持三因素結構。再以復原力量表（Connor 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CD-RISC）為效標，結果支持寬恕與復原力呈正向關聯的推論，顯示具有良好同時效度。

報復是與寬恕相關且相對的概念，係指人們認為受到不正當的侵害時，為了維護和恢復個人的自尊與社會地位，所發起的對加害者的攻擊行動，並伴隨著憤怒、羞恥和預期快感等情緒（Jackson et al., 2019; Nussbaum, 2018）。

過去已有許多研究支持寬恕與幸福的正向關聯（例如，Akhtar & Barlow, 2018; Bono et al., 2008; Gao et al., 2022; Gismero-González et al., 2020; Toussaint & Webb, 2005; Worthington et al., 2007）。本土的研究方面，李新民與陳蜜桃（2009）的研究結果支持寬恕與幸福感的正向關聯，並以交叉延宕結構方程模式分析寬恕與焦慮的時間序列影響，結果發現寬恕對後續的焦慮有顯著的紓解作用，但是焦慮對於寬恕的作用卻是不顯著的。楊鳳玲與陳柏霖（2017）以國小五年級學童為對象的準實驗研究，結果顯示寬恕教育課程可以顯著提升兒童的寬恕態度及幸福感。

根據兩因素寬恕的內涵及多向度德福觀理論，我們推論「內在消極調和」信念與寬恕他人有正向關聯，而「外在消極調和」信念則與寬恕他人有負向關聯，並與報復有正向關聯。推論的理路是，當人們重視不道德行為的外在惡果時，更能合理化報復的動機；反之，當人們重視不道德行為的內在惡果時，更傾向不追求對加害者的外在懲罰，而放棄報復，給予寬恕。此外，我們認為寬恕與幸福之間的關係可能受到德福觀「內在消極調和」信念的部分中介。

表 6
多向度德福觀與各變項之間的相關性推論

	公正 世界信念	個人公正 世界信念	普遍公正 世界信念	責難 受害者	道德 認同	利他	聯結 道德觀	個人 道德觀	道德 疏離	復原力	寬恕	報復
整體德福觀	+	+	+		+	+			-	+		
內在調和		+		-	+			+		+		
外在調和			+	+			+					
積極調和		+				+						
消極調和			+	+					-			
內在積極調和				-	+	+		+		+		
內在消極調和					+			+		+	+	
外在積極調和						+	+					
外在消極調和				+			+		-		-	+

結論

總結而言，本文提出的「多向度德福觀」心理構念模式可以彌補既有理論的不足，也清楚地理解人們日常生活中對於德福關係之各種信念。應用「多向度德福觀」構念模式進行推論，有助於釐清現有理論的混亂不明或矛盾之處。未來可以發展「多向度德福觀」心理構念模式的測量工具，並探討德福觀與其他道德心理與行為的關聯與機制，從而對諸多相關心理行為現象提供更周詳的理解，也可進一步在道德實踐與道德教育上提供實用建議。

舉例而言，在道德實踐方面，多向度德福觀的測量可以促進人們對自身的道德認知的覺察和反思。舉例而言，責備受害者的心態、怨天尤人的想法，都可能源於外在調和的德福觀信念。偏好嚴厲報復懲罰的態度（極端情況將導致以暴制暴的道德異化行為，*moral deviation*），也可能源自外在消極調和的德福觀信念。上述覺察和反思相信有助於人們避免道德異化的心理和行為，也能夠更一致穩定的採取道德行動。

在道德教育方面，多向度德福觀的測量結果可以提供更清晰的道德認知信念圖像，讓教師可以應材施教，也可以針對不同的觀點進行更深入的討論。舉例而言，外在積極調和信念高的學生，將會有較高的期待道德行為受到外在酬賞，當外在酬賞不如預期時，將導致道德動機降低。教師則可以引導學生思考和體會道德行為的內在酬賞。整體消極調和信念高的學生，對於積極道德行動（例如，主動助人、社會正義倡議）的動機偏低，教師可以促進學生關於積極道德行動的思考和討論，探討積極道德行動與自身福祉的關聯或是其他意義（例如，展現自我價值、影響力）。

參考文獻

- 李仁豪、余民寧（2016）：〈心理幸福感量表簡式中文版信效度及測量不變性：以大學生為樣本並兼論測量不變性議題〉。《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46，127-154。[Li, R.-H., & Yu, M.-N. (2016). Reliability, validity, and measurement invariance of the brief Chinese version of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Scale among college students. *Chinese Journal of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46, 127-154.]
- 李琪明（2020）：〈多面向道德情意量表之發展與信效度考驗〉。《教育心理學報》，51，561-583。[Lee, A. C.-M. (2020). Multidimensional Affective Morality Scale: Development an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evaluation.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51, 561-583.] [https://doi.org/10.6251/BEP.202006_51\(4\).0003](https://doi.org/10.6251/BEP.202006_51(4).0003)
- 李新民、陳蜜桃（2009）：〈寬恕的測量及其與焦慮的潛在關聯〉。《教育心理學報》，41，1-27。[Lee, H.-M., & Chen, M.-T. (2009). Assessment of poten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giveness and anxiety.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41, 1-27.] <https://doi.org/10.6251/BEP.20081001>

- 余民寧、陳柏霖（2014）：〈幸福感教學對促進大學生正向心理的改變〉。《教育學報》，42（1），1–26。[Yu, M.-N., & Chen, P.-L. (2014). The influences of well-being instruction on college students' positive thinking. *Education Journal*, 42(1), 1–26.]
- 沈家綺、連倬誼（2022）：〈青少年復原力量表之編制與驗證〉。《教育心理學報》，54，131–153。[Shen, C.-C., & Lien, H.-Y. (2022).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n Adolescent Resilience Scale.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54, 131–153.]
[https://doi.org/10.6251/BEP.202209_54\(1\).0006](https://doi.org/10.6251/BEP.202209_54(1).0006)
- 林佩儒（2010）：《先秦德福觀研究》（未出版博士論文），淡江大學。[Lin, P.-J. (2010). *The research of the conception of virtue-happiness in Pre-Chin Dynasty*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Tamkang University.] <https://doi.org/10.6846/TKU.2010.00932>
- 邱振訓（2015）：《道德的理由》（未出版博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Chiu, C.-H. (2015). *Reasons to be moral*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施依吾（2011）：《老莊德福觀研究》（未出版博士論文），淡江大學。[Shih, Y.-W. (2011). *The study of Lao-Tzu's and Zhuang-Zi's idea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ality and blis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Tamkang University.] <https://doi.org/10.6846/TKU.2011.00616>
- 韋政通（2012）：《中國思想史（十四版）》。水牛出版社。[Wei, C.-T. (2012). *Zhongguo sixiangshi* (14th ed.). Buffalo Book Company.]
- 孫效智（2002）：《宗教、道德與幸福的吊詭》。立緒出版社。[Sun, H.-C. (2002). *Zongjiao daode yu xingfu de diaogui*. Li Syu.]
- 陳伊琳（2016）：〈Aristotle 幸福論觀點下的致福之道與幸福的脆弱性：幸福、運氣與品德教育〉。《教育研究集刊》，62（2），1–34。[Chen, Y.-L. (2016). Pursuit of happiness and the vulnerability of happiness: An Aristotelian eudaimonistic viewpoint-happiness, luck, and character education.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62(2), 1–34.] <https://doi.org/10.3966/102887082016066202001>
- 陳伊琳（2018）：〈重訪德與福的關係：正向心理學的新詮釋及其對品德教育的啟示〉。《當代教育研究季刊》，26（4），47–82。[Chen, Y.-L. (2018). Revisit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virtue and happiness: A new positive psych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it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character education.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Research Quarterly*, 26(4), 47–82.] [https://doi.org/10.6151/CERQ.201812_26\(4\).0002](https://doi.org/10.6151/CERQ.201812_26(4).0002)
- 陳舜文、邱振訓（2011）：〈道德判斷的「雙重歷程模式」：認知、情緒與文化的整合觀點〉。《本土心理學研究》，36，33–76。[Chen, S.-W., & Chiu, C.-H. (2011). The dual-process model of moral judgment: An integrated viewpoint of cognition, emotion, and culture. *Indigenous Psychological Research in Chinese Societies*, 36, 33–76.] <https://doi.org/10.6254/2011.36.33>
- 張俊（2004）：〈宗教為德行許諾幸福—道教、佛教、基督教三模式〉。《世界宗教學刊》，4，135–153。[Zhang, J. (2004). Religions promise happiness for virtues: The three modes of Daoism, Buddhism, Christianity. *Journal of World Religions*, 4, 135–153.]
- 梁進龍、楊錦登、崔新玲、吳和堂（2021）：〈海峽兩岸大學生求意義的意志、心流與心理幸福感之關係：中介與多群組的分析〉。《教育心理學報》，53，335–358。[Liang, J.-L., Yang, C.-D.,

- Cui, X.-L., & Wu, H.-T. (2021). Relationship among the will to meaning, flow,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cross-strait college students: An analysis of mediating effects and multiple groups.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53, 335–358. [[https://doi.org/10.6251/BEP.202112_53\(2\).0004](https://doi.org/10.6251/BEP.202112_53(2).0004)]
- 粘瑞狄、吳治翰、吳聰義、楊高騰、念裕祥、張育愷（2020）：〈正念、正念訓練與心理健康：預設模式網絡之觀點〉。《教育心理學報》，52，219–240。[Nien, J.-T., Wu, C.-H., Wu, T.-Y., Yang, K.-T., Nien, Y.-H., & Chang, Y.-K. (2020). Mindfulness, mindfulness training and mental heal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fault mode network.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52, 219–240. [[https://doi.org/10.6251/BEP.202009_52\(1\).0009](https://doi.org/10.6251/BEP.202009_52(1).0009)]
- 黃藹（2000）：〈德行倫理學的復興與當代道德教育〉。《哲學與文化》，27，522–531。[Huang, H. (2000). The renaissance of virtue ethics and contemporary education. *Universitas: Monthly Review of Philosophy and Culture*, 27, 522–531. [<https://doi.org/10.7065/MRPC.200006.0522>]
- 鄔昆如（2007）：〈目的論、幸福論、德行論三合一體系的研究〉。《哲學與文化》，34（5），61–74。[Woo, P. K. Y. (2007). On the trinity of teleology, happiness ethics and virtue ethics. *Universitas: Monthly Review of Philosophy and Culture*, 34(5), 61–74. [<https://doi.org/10.7065/MRPC.200705.0061>]
- 葉啟政（2000）：《進出「結構—行動」的困境：與當代西方社會學理論論述對話》。三民書局。[Yeh, C. (2000). *Jinchu "jiegou—xingdong" de kunjing: Yu dangdai xifang shehuixue lilun lunshu duihua*. San Min Book.]
- 楊鳳玲、陳柏霖（2017）：〈寬恕教育課程對國小五年級學生寬恕態度與幸福感之影響〉。《教育心理學報》，48，351–370。[Yang, F.-L., & Chen, P.-L. (2017). The effects of forgiveness education course on forgiveness attitude and well-being of fifth-grade students.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48, 351–370. [<https://doi.org/10.6251/BEP.20160223>]
- 蔡明昌（2018）：〈大學生果報信念量表的建構與發展之研究〉。《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51，181–216。[Tsai, M.-C. (2018). A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Karma Belief Scale for undergraduate in Taiwan. *Chinese Journal of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51, 181–216. [<https://doi.org/10.3966/172851862018040051006>]
- 蔡家和（2007）：〈中國哲學天道論者對於德福一致問題之解決方式〉。《當代儒學研究》，1，105–134。[Tsai, C.-H. (2007). The solution of the problem of summum bonum according to Chinese philosophers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ce of Tao. *Journal for Contemporary Studies of Confucianism*, 1, 105–134. [<https://doi.org/10.29906/IMR.200701.0003>]
- 蕭舒謙、林秀玲、余晨瑋、吳相儀（2023）：〈「心田寬恕量表」之中文文化與信、效度分析〉。《教育心理學報》，54，685–703。[Hsiao, S.-C., Lin, H.-L., Yu, C.-W., & Wu, H.-Y. (2023).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Heartland Forgiveness Scale.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54, 685–703. [[https://doi.org/10.6251/BEP.202303_54\(3\).0008](https://doi.org/10.6251/BEP.202303_54(3).0008)]
- 釋印順（1988）：《印度佛教思想史》。正聞出版社。[Shih, Y.-S. (1988). *Yindu Fojiao sixiangshi*. Zhengwen Publishing House.]
- Akhtar, S., & Barlow, J. (2018). Forgiveness therapy for the promotion of mental well-being: A

-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Trauma, Violence, & Abuse*, 19(1), 107–122. <https://doi.org/10.1177/1524838016637079>
- Aquino, K., & Reed, A., II. (2002). The self-importance of moral ident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3(6), 1423–1440.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83.6.1423>
- Arvanitis, A., & Stichter, M. (2023). Why being morally virtuous enhances well-being: A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approach. *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 52(3), 362–378. <https://doi.org/10.1080/03057240.2022.2066640>
- Azañedo, C. M., Artola, T., Sastre, S., & Alvarado, J. M. (2021). Character strengths predict subjective well-being,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nd psychopathological symptoms, over and above functional social support.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2, Article 661278.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21.661278>
- Azizan, N. H., & Mahmud, Z. (2018). Determinant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A systematic review. *Environment-Behaviour Proceedings Journal*, 3(7), 135–141. <https://doi.org/10.21834/e-bpj.v3i7.1228>
- Bandura, A. (1999). Moral disengagement in the perpetration of inhumaniti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3(3), 193–209. https://doi.org/10.1207/s15327957pspr0303_3
- Bandura, A. (2002). Selective moral disengagement in the exercise of moral agency. *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 31(2), 101–119. <https://doi.org/10.1080/0305724022014322>
- Bandura, A., Barbaranelli, C., Caprara, G. V., & Pastorelli, C. (1996). Mechanisms of moral disengagement in the exercise of moral agenc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1(2), 364–374.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71.2.364>
- Bartholomaeus, J., & Strelan, P. (2019). The adaptive, approach-oriented correlates of belief in a just world for the self: 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51, Article 109485. <https://doi.org/10.1016/j.paid.2019.06.028>
- Bartholomaeus, J., Strelan, P., & Burns, N. (2024). Does the empowering function of the belief in a just world generalise? Broad-base cross-sectional and longitudinal evidence. *Social Justice Research*, 37(1), 57–75. <https://doi.org/10.1007/s11211-023-00412-y>
- Batson, C. D. (2008). Moral masquerades: Experimental exploration of the nature of moral motivation. *Phenomenolog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 7(1), 51–66. <https://doi.org/10.1007/s11097-007-9058-y>
- Bering, J. M., & Johnson, D. D. P. (2005). “O Lord... You perceive my thoughts from afar”: Recursiveness and the evolution of supernatural agency. *Journal of Cognition and Culture*, 5(1–2), 118–142. <https://doi.org/10.1163/1568537054068679>
- Blasi, A. (1983). Moral cognition and moral action: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Developmental Review*, 3(2), 178–210. [https://doi.org/10.1016/0273-2297\(83\)90029-1](https://doi.org/10.1016/0273-2297(83)90029-1)
- Blasi, A. (1993). The development of identity: Some implications for moral functioning. In G. G. Noam, T. E. Wren, G. Nunner-Winkler, & W. Edelstein (Eds.), *The moral self* (pp. 99–122). The MIT Press.

- Blasi, A. (1999). Emotions and moral motivation.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 29(1), 1–19. <https://doi.org/10.1111/1468-5914.00088>
- Bok, S. (2010). *Exploring happiness: From Aristotle to brain science*. Yale University Press.
- Bolton, K. W., Hall, J. C., Blundo, R., & Lehmann, P. (2017). The role of resilience and resilience theory in solution-focused practice. *Journal of Systemic Therapies*, 36(3), 1–15. <https://doi.org/10.1521/jsyt.2017.36.3.1>
- Bono, G., McCullough, M. E., & Root, L. M. (2008). Forgiveness, feeling connected to others, and well-being: Two longitudinal studi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4(2), 182–195. <https://doi.org/10.1177/0146167207310025>
- Book, A., Stark, S., MacEachern, J., Forth, A., Visser, B., Wattam, T., Young, J., Power, J., & Roters, J. (2020).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 Psychopathy and fear enjoymen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88(6), 1286–1301. <https://doi.org/10.1111/jopy.12571>
- Campbell-Sills, L., & Stein, M. B. (2007). Psychometric analysis and refinement of the 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CD-RISC): Validation of a 10-item measure of resilience.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20(6), 1019–1028. <https://doi.org/10.1002/jts.20271>
- Carr, D. (2024). Love, knowledge (wisdom) and justice: Moral education beyond the cultivation of Aristotelian virtuous character. *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 53(2), 273–291. <https://doi.org/10.1080/03057240.2023.2219029>
- Chen, F. F., Jing, Y., Hayes, A., & Lee, J. M. (2013). Two concepts or two approaches? A bifactor analysis of psychological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An Interdisciplinary Forum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14(3), 1033–1068. <https://doi.org/10.1007/s10902-012-9367-x>
- Chien, C.-L., Chen, P.-L., Chu, P.-J., Wu, H.-Y., Chen, Y.-C., & Hsu, S.-C. (2020).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Subjective Happiness Scale: Validation and convergence with multidimensional measures. *Journal of Psychoeducational Assessment*, 38(2), 222–235. <https://doi.org/10.1177/0734282919837403>
- Colby, A., & Damon, W. (1992). *Some do care: Contemporary lives of moral commitment*. Free Press.
- Connor, K. M., & Davidson, J. R. T. (2003). Development of a new resilience scale: The 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CDRISC). *Depression and Anxiety*, 18(2), 76–82. <https://doi.org/10.1002/da.10113>
- Cui, P., Mao, Y., Shen, Y., & Ma, J. (2021). Moral identity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mediating role of identity commitment qual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8(18), Article 9795. <https://doi.org/10.3390/ijerph18189795>
- Curren, R., & Ryan, R. M. (2020). Moral self-determination: The nature, existence, and formation of moral motivation. *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 49(3), 295–315. <https://doi.org/10.1080/03057240.2020.1793744>
- Dalbert, C. (1999). The world is more just for me than generally: About the personal belief in a just world scale's validity. *Social Justice Research*, 12(2), 79–98. <https://doi.org/10.1023/A:1022091609047>
- Damon, W. (1984). Self-understanding and moral development from childhood to adolescence. In W. M.

- Kurtines & J. L. Gewirtz (Eds.), *Morality, moral behavior, and moral development* (pp. 109–127). John Wiley & Sons.
- Deci, E. L., & Ryan, R. M. (2000). The “what” and “why” of goal pursuits: Human needs and the self-determination of behavior. *Psychological Inquiry, 11*(4), 227–268.
https://doi.org/10.1207/S15327965PLI1104_01
- Diener, E., Emmons, R. A., Larsen, R. J., & Griffin, S. (1985). 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49*(1), 71–75. https://doi.org/10.1207/s15327752jpa4901_13
- Disabato, D. J., Goodman, F. R., Kashdan, T. B., Short, J. L., & Jarden, A. (2016). Different types of well-being? A cross-cultural examination of hedonic and eudaimonic well-being.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28*(5), 471–482. <https://psycnet.apa.org/doi/10.1037/pas0000209>
- Dolan, P., Peasgood, T., & White, M. (2008). Do we really know what makes us happy? A review of the economic literature on the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subjective well-being.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29*(1), 94–122. <https://doi.org/10.1016/j.joep.2007.09.001>
- Duncan, G. (2010). Should happiness-maximization be the goal of government?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An Interdisciplinary Forum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11*(2), 163–178. <https://doi.org/10.1007/s10902-008-9129-y>
- Enright, R. D., Eastin, D. L., Golden, S., Sarinopoulos, I., & Freedman, S. (1991). Interpersonal forgiveness within the helping professions: An attempt to resolve differences of opinion. *Counseling and Values, 36*(2), 84–103. <https://doi.org/10.1002/j.2161-007X.1991.tb00966.x>
- Enright, R. D., Gassin, E. A., & Wu, C.-R. (1992). Forgiveness: A developmental view. *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 21*(2), 99–114. <https://doi.org/10.1080/0305724920210202>
- Förster, J., Higgins, E. T., & Idson, L. C. (1998). Approach and avoidance strength during goal attainment: Regulatory focus and the “goal looms larger” effec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5*(5), 1115–1131. <https://psycnet.apa.org/doi/10.1037/0022-3514.75.5.1115>
- Frederick, S., & Loewenstein, G. (1999). Hedonic adaptation. In D. Kahneman, E. Diener, & N. Schwarz (Eds.), *Well-being: The foundations of hedonic psychology* (pp. 302–329).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Gao, F., Li, Y., & Bai, X. (2022). Forgivenes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 meta-analysis review.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86*(Part B), Article 111350. <https://doi.org/10.1016/j.paid.2021.111350>
- Garcia, D., Moradi, S., Amato, C., Granjard, A., & Cloninger, K. (2018). Well-being and moral identity. *Psych Journal, 7*(1), 53–54. <https://doi.org/10.1002/pchj.205>
- Gert, B. (1973). *The moral rules: A new rational foundation for morality*. Harper & Row.
- Gismero-González, E., Jódar, R., Martínez, M. P., Carrasco, M. J., Cagigal, V., & Prieto-Ursúa, M. (2020). Interpersonal offenses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The mediating role of forgiveness.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An Interdisciplinary Forum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21*(1), 75–94. <https://doi.org/10.1007/s10902-018-00070-x>
- Graham, J., Haidt, J., Koleva, S., Motyl, M., Iyer, R., Wojcik, S. P., & Ditto, P. H. (2013). Moral foundations

- theory: The pragmatic validity of moral pluralism. In P. Devine & A. Plant (Eds.),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 47, pp. 55–130). Academic Press.
<https://doi.org/10.1016/B978-0-12-407236-7.00002-4>
- Graham, J., Haidt, J., & Nosek, B. A. (2009). Liberals and conservatives rely on different sets of moral found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6*(5), 1029–1046.
<https://doi.org/10.1037/a0015141>
- Hafer, C. L., Busseri, M. A., Rubel, A. N., Drolet, C. E., & Cherrington, J. N. (2020). A latent factor approach to belief in a just world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well-being. *Social Justice Research, 33*(1), 1–17. <https://doi.org/10.1007/s11211-019-00342-8>
- Haidt, J. (2007). The new synthesis in moral psychology. *Science, 316*(5827), 998–1002.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1137651>
- Haidt, J. (2012). *The righteous mind: Why good people are divided by politics and religion*. Pantheon/Random House.
- Hardy, S. A. (2006). Identity, reasoning, and emotion: An empirical comparison of three sources of moral motivation. *Motivation and Emotion, 30*(3), 207–215. <https://doi.org/10.1007/s11031-006-9034-9>
- Hardy, S. A., & Carlo, G. (2005). Identity as a source of moral motivation. *Human Development, 48*(4), 232–256. <https://doi.org/10.1159/000086859>
- Hardy, S. A., & Carlo, G. (2011). Moral identity: What is it, how does it develop, and is it linked to moral action? *Child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5*(3), 212–218.
<https://doi.org/10.1111/j.1750-8606.2011.00189.x>
- Hart, D. (2005). The development of moral identity. In G. Carlo & C. P. Edwards (Eds.), *Moral motivation through the life span* (pp. 165–196).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 Hausler, M., Strecker, C., Huber, A., Brenner, M., Höge, T., & Höfer, S. (2017). Distinguishing relational aspects of character strengths with subjective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8*, Article 1159.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21.661278>
- Henricson, C. (2016). *Morality and public policy*. Policy Press. <https://doi.org/10.51952/9781447323846>
- Hertz, S. G., & Krettenauer, T. (2016). Does moral identity effectively predict moral behavior?: A meta-analysis.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20*(2), 129–140. <https://doi.org/10.1037/gpr0000062>
- Higgins, E. T. (1997). Beyond pleasure and pain. *American Psychologist, 52*(12), 1280–1300.
<https://doi.org/10.1037/0003-066X.52.12.1280>
- Higgins, E. T., Roney, C. J. R., Crowe, E., & Hymes, C. (1994). Ideal versus ought predilections for approach and avoidance distinct self-regulatory system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6*(2), 276–286.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66.2.276>
- Huta, V., & Waterman, A. S. (2014). Eudaimonia and its distinction from hedonia: Developing a classification and terminology for understanding conceptual and operational definitions.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15*(6), 1425–1456. <https://doi.org/10.1007/s10902-013-9485-0>
- Hwang, K.-K. (1998). Two moralities: Reinterpreting the findings of empirical research on moral reasoning in Taiwan.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3), 211–238.

- <https://doi.org/10.1111/1467-839X.00015>
- Ito, T. A., Larsen, J. T., Smith, N. K., & Cacioppo, J. T. (1998). Negative information weighs more heavily on the brain: The negativity bias in evaluative categoriz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5(4), 887–900.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75.4.887>
- Jackson, J. C., Choi, V. K., & Gelfand, M. J. (2019). Revenge: A multilevel review and synthesi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70, 319–345.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psych-010418-103305>
- Johnson, D., & Bering, J. (2006). Hand of god, mind of man: Punishment and cognition in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4, 219–233. <https://doi.org/10.1177/147470490600400119>
- Joshanloo, M. (2014). Eastern conceptualizations of happiness: Fundamental differences with western views.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An Interdisciplinary Forum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15(2), 475–493. <https://doi.org/10.1007/s10902-013-9431-1>
- Joshanloo, M. (2016). Revisiting the empirical distinction between hedonic and eudaimonic aspects of well-being using exploratory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An Interdisciplinary Forum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17(5), 2023–2036. <https://doi.org/10.1007/s10902-015-9683-z>
- Joshanloo, M. (2019). Investigat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ver two decades. *Emotion*, 19(1), 183–187. <https://doi.org/10.1037/emo0000414>
- Kahneman, D. (1999). Objective happiness. In D. Kahneman, E. Diener, & N. Schwarz (Eds.), *Well-being: The foundations of hedonic psychology* (pp. 3–25).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Kahneman, D. (2000). Experienced utility and objective happiness: A moment-based approach. In D. Kahneman, & A. Tversky (Eds.), *Choices, values, and frames* (pp. 673–69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CBO9780511803475>
- Kahneman, D., & Tversky, A. (1979).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Econometrica*, 47(2), 263–291. <https://doi.org/10.2307/1914185>
- Kaplan, U. (2017). Moral motivation as a dynamic developmental process: Toward an integrative synthesis.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 47(2), 195–221. <https://doi.org/10.1111/jtsb.12116>
- Karris Bachik, M. A., Carey, G., & Craighead, W. E. (2021). VIA character strengths among US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ir associations with happiness, well-being, resiliency, academic success and psychopathology. *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16(4), 512–525. <https://doi.org/10.1080/17439760.2020.1752785>
- Kartali, G., & Kelemen-Erdos, A. (2020). Motivate or reward altruistic behavior? A literature review of altruism theories. *The Macrotheme Review*, 9(1), 117–127.
- Kaufman, S. B., & Jauk, E. (2020). Healthy selfishness and pathological altruism: Measuring two paradoxical forms of selfishnes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1, Article 1006.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20.01006>
- Kohlberg, L. A. (1976). Moral stages and moralization: The cognitive developmental approach. In T. Lickona (Ed.), *Moral development and behavior: Theory, research, and social issues* (pp. 31–53).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Krettenauer, T. (2011). The dual moral self: Moral centrality and internal moral motivation. *The Journal of Genetic Psychology: Research and Theory on Human Development*, 172(4), 309–328. <https://doi.org/10.1080/00221325.2010.538451>
- Krettenauer, T. (2020). Moral identity as a goal of moral action: A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perspective. *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 49(3), 330–345. <https://doi.org/10.1080/03057240.2019.1698414>
- Krettenauer, T., & Stichter, M. (2023). Moral identity and the acquisition of virtue: A self-regulation view.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27(4), 396–409. <https://doi.org/10.1177/10892680231170393>
- Krettenauer, T., & Victor, R. (2017). Why be moral? Moral identity motivation and age.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53(8), 1589–1596. <https://doi.org/10.1037/dev0000353>
- Kristjánsson, K. (2019). *Flourishing as the aim of education: A neo-Aristotelian view*. Routledge. <https://doi.org/10.4324/9780429464898>
- Lahvis, G. P. (2016). Social reward and empathy as proximal contributions to altruism: The camaraderie effect. In M. Wöhr & S. Krach (Eds.), *Social behavior from rodents to humans* (pp. 127–157). Springer Nature. https://doi.org/10.1007/7854_2016_449
- Lakoff, G. (2008). *The political mind: A cognitive scientist's guide to your brain and its politics*. Penguin Publishing Group.
- Lama, D. (2014). Happiness from a Buddhist perspective. *Journal of Law and Religion*, 29(1), 5–13. <https://doi.org/10.1017/jlr.2013.13>
- Lang, M., Purzycki, B. G., Apicella, C. L., Atkinson, Q. D., Bolyanatz, A., Cohen, E., Handley, C., Klocová, K., Lesorogol, C., Mathew, S., McNamara, R. A., Moya, C., Placek, C. D., Soler, M., Vardy, T., Weigel, J. L., Willard, A. K., Xygalatas, D., Norenzayan, A., & Henrich, J. (2019). Moralizing gods, impartiality and religious parochialism across 15 societies.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Biological Sciences*, 286(1898), Article 20190202. <https://doi.org/10.1098/rspb.2019.0202>
- Lerner, M. J. (1980). *The belief in a just world: A fundamental delusion*. Spr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 Lipkus, I. M., Dalbert, C., & Siegler, I. C. (1996). The importance of distinguishing the belief in a just world for self versus for others: Implications for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2(7), 666–677. <https://doi.org/10.1177/0146167296227002>
- Lucas, R. E., Diener, E., & Suh, E. (1996). Discriminant validity of well-being measur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1(3), 616–628.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71.3.616>
- Lyubomirsky, S., & Lepper, H. S. (1999). A measure of subjective happiness: Preliminary reliability and construct validation.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46(2), 137–155. <https://doi.org/10.1023/A:1006824100041>
- Marsh, A. A. (2019). The caring continuum: Evolved hormonal and proximal mechanisms explain prosocial and antisocial extreme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70, 347–371.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psych-010418-103010>
- McMahon, D. M. (2004). From the happiness of virtue to the virtue of happiness: 400 B.C.–A.D. 1780. *Daedalus*, 133(2), 5–17. <https://doi.org/10.1162/001152604323049343>

- McMahon, D. M. (2006). *Happiness: A history*. Atlantic Monthly Press.
- Mieth, C. (2017). Morality and happiness: Two precarious situations? In K. Bauer, S. Varga, & C. Mieth (Eds.), *Dimensions of practical necessity* (pp. 237–252). Palgrave Macmillan.
https://doi.org/10.1007/978-3-319-52398-9_12
- Millgram, E. (2000). What's the use of utility?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29(2), 113–136.
<https://doi.org/10.1111/j.1088-4963.2000.00113.x>
- Montada, L., & Lerner, M. J. (Eds.). (1998). *Responses to victimizations and belief in a just world*. Plenum Press. <https://doi.org/10.1007/978-1-4757-6418-5>
- Niemiec, R. M. (2023). Mental health and character strengths: The dual role of boosting well-being and reducing suffering. *Mental Health and Social Inclusion*, 27(4), 294–316.
<https://doi.org/10.1108/MHSI-01-2023-0012>
- Nili, S. (2019). *The people's duty: Collective agency and the morality of public poli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9781108691680>
- Norenzayan, A. (2013). *Big gods: How religion transformed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Norenzayan, A., Shariff, A. F., Gervais, W. M., Willard, A. K., McNamara, R. A., Slingerland, E., & Henrich, J. (2016). The cultural evolution of prosocial religions.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39, Article e1. <https://doi.org/10.1017/S0140525X14001356>
- Novemsky, N., & Kahneman, D. (2005). The boundaries of loss aversion.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42(2), 119–128. <https://doi.org/10.1509/jmkr.42.2.119.62292>
- Nunner-Winkler, G. (2007). Development of moral motivation from childhood to early adulthood. *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 36(4), 399–414. <https://doi.org/10.1080/03057240701687970>
- Nussbaum, M. C. (2018). *Anger and forgiveness: Resentment, generosity, justi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Oakley, B. A. (2013). Concepts and implications of altruism bias and pathological altruism.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0(Suppl. 2), 10408–10415. <https://doi.org/10.1073/pnas.1302547110>
- Oakley, B. A., Knafo, A., Madhavan, G., & Wilson, D. S. (Eds.). (2011). *Pathological altru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93/acprof:oso/9780199738571.001.0001>
- Ottaviani, F. (2024). Sustainable well-being indicators and public policy: A cluster analysis. *Forum for Social Economics*, 53(1), 89–100. <https://doi.org/10.1080/07360932.2022.2152850>
- Peterson, C., & Seligman, M. E. (2004). *Character strengths and virtues: A handbook and classific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fattheicher, S., Nielsen, Y. A., & Thielmann, I. (2022). Prosocial behavior and altruism: A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44, 124–129.
<https://doi.org/10.1016/j.copsyc.2021.08.021>
- Phillips, J., De Freitas, J., Mott, C., Gruber, J., & Knobe, J. (2017). True happiness: The role of morality in the folk concept of happines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46(2), 165–181.

- <https://doi.org/10.1037/xge0000252>
- Purzycki, B. G., Apicella, C., Atkinson, Q. D., Cohen, E., McNamara, R. A., Willard, A. K., Xygalatas, D., Norenzayan, A., & Henrich, J. (2016). Moralistic gods, supernatural punishment and the expansion of human sociality. *Nature*, *530*(7590), 327–330. <https://doi.org/10.1038/nature16980>
- Rhoads, S. A., & Marsh, A. A. (2023). Doing good and feeling good: Relationships between altruism and well-being for altruists, beneficiaries, and observers. In J. F. Helliwell, R. Layard, J. D. Sachs, L. B. Akinin, J.-E. De Neve, & S. Wang (Eds.), *World Happiness Report 2023* (11th ed., pp. 103–130).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lutions Network.
- Ricard, M. (2014). A Buddhist view of happiness. *Journal of Law and Religion*, *29*(1), 14–29. <https://doi.org/10.1017/jlr.2013.9>
- Richardson, G. E. (2002). The metatheory of resilience and resiliency.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58*(3), 307–321. <https://doi.org/10.1002/jclp.10020>
- Rozin, P., & Royzman, E. B. (2001). Negativity bias, negativity dominance, and contag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5*(4), 296–320. https://doi.org/10.1207/S15327957PSPR0504_2
- Ruch, W., Martínez-Martí, M. L., Proyer, R. T., & Harzer, C. (2014). The Character Strengths Rating Form (CSRF): Development and initial assessment of a 24-item rating scale to assess character strength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68*, 53–58. <https://doi.org/10.1016/j.paid.2014.03.042>
- Ryan, R. M., & Deci, E. L. (2001). On happiness and human potentials: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hedonic and eudaimonic well-being.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2*, 141–166.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psych.52.1.141>
- Ryff, C. D. (1989).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or is it? Explorations on the meaning of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7*(6), 1069–1081.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57.6.1069>
- Ryff, C. D., & Keyes, C. L. M. (1995). The structure of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revisited.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9*(4), 719–727.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69.4.719>
- Schroeder, T., Roskies, A. L., & Nichols, S. (2010). Moral motivation. In J. M. Doris (Ed.) & Moral Psychology Research Group, *The moral psychology handbook* (pp. 72–11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93/acprof:oso/9780199582143.003.0004>
- Seligman, M. E. P. (2011). *Flourish: A visionary new understanding of happiness and well-being*. Free Press.
- Shariff, A. F., & Norenzayan, A. (2011). Mean gods make good people: Different views of god predict cheating behavior.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the Psychology of Religion*, *21*(2), 85–96. <https://doi.org/10.1080/10508619.2011.556990>
- Shariff, A. F., Willard, A. K., Andersen, T., & Norenzayan, A. (2016). Religious priming: A meta-analysis with a focus on prosociality.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20*(1), 27–48. <https://doi.org/10.1177/1088868314568811>
- Shryack, J., Steger, M. F., Krueger, R. F., & Kallie, C. S. (2010). The structure of virtue: An empirical

- investigation of the dimensionality of the virtues in action Inventory of Strength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48(6), 714–719. <https://doi.org/10.1016/j.paid.2010.01.007>
- Shweder, R. A., Much, N. C., Mahapatra, M., & Park, L. (1997). The “big three” of morality (autonomy, community, divinity) and the “big three” explanations of suffering. In A. M. Brandt & P. Rozin (Eds.), *Morality and health* (pp. 119–169). Taylor & Frances/Routledge.
- Sokol-Hessner, P., & Rutledge, R. B. (2019). The psychological and neural basis of loss aversion.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8(1), 20–27. <https://doi.org/10.1177/0963721418806510>
- Su, R., Tay, L., & Diener, E. (2014). Th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comprehensive inventory of thriving (CIT) and the brief inventory of thriving (BIT). *Applied Psychology: Health and Well Being*, 6(3), 251–279. <https://doi.org/10.1111/aphw.12027>
- Sumner, L. (1996). *Welfare, happiness, and eth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utton, R. M., Stoeber, J., & Kamble, S. V. (2017). Belief in a just world for oneself versus others, social goal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13, 115–119. <https://doi.org/10.1016/j.paid.2017.03.026>
- Thompson, L. Y., Snyder, C. R., Hoffman, L., Michael, S. T., Rasmussen, H. N., Billings, L. S., Heinze, L., Neufeld, J. E., Shorey, H. S., Roberts, J. C., & Roberts, D. E. (2005). Dispositional forgiveness of self, others, and situ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73(2), 313–360. <https://doi.org/10.1111/j.1467-6494.2005.00311.x>
- Tiberius, V., & Plakias, A. (2010). Well-being. In J. M. Doris (Ed.) & Moral Psychology Research Group, *The moral psychology handbook* (pp. 401–43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omasello, M. (2019). *Becoming human: A theory of ontogeny*.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4159/9780674988651>
- Toussaint, L., & Webb, J. R. (2005).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connections between forgiveness,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In E. L. Worthington, Jr. (Ed.), *Handbook of forgiveness* (1st ed., pp. 349–362). Routledge. <https://doi.org/10.4324/9781351123341>
- Tsai, C. (2023). *Wisdom: A skill the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9781009222884>
- Tusche, A., & Bas, L. M. (2021). Neurocomputational models of altruistic decision-making and social motives: Advances, pitfalls, and future directions. *WIREs Cognitive Science*, 12(6), Article e1571. <https://doi.org/10.1002/wcs.1571>
- Vaish, A., Grossmann, T., & Woodward, A. (2008). Not all emotions are created equal: The negativity bias in social-emotional development.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4(3), 383–403. <https://doi.org/10.1037/0033-2909.134.3.383>
- van den Bos, K., & Maas, M. (2009). On the psychology of the belief in a just world: Exploring experiential and rationalistic paths to victim blaming.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5(12), 1567–1578. <https://doi.org/10.1177/0146167209344628>
- van Prooijen, J.-W., & van den Bos, K. (2009). We blame innocent victims more than I do: Self-construal

- level moderates responses to just-world threat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5(11), 1528–1539. <https://doi.org/10.1177/0146167209344728>
- Vlerick, M. (2021). Explaining human altruism. *Synthese*, 199(1–2), 2395–2413. <https://doi.org/10.1007/s11229-020-02890-y>
- Wagner, L., Gander, F., Proyer, R. T., & Ruch, W. (2020). Character strengths and PERMA: Investigating the relationships of character strengths with a multidimensional framework of well-being. *Applied Research in Quality of Life*, 15(2), 307–328. <https://doi.org/10.1007/s11482-018-9695-z>
- Watson, D., Clark, L. A., & Tellegen, A. (1988).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brief measure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The PANAS scal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4(6), 1063–1070.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54.6.1063>
- Weber, M. (2021). Relations between character strength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 brief overview. *Medical Research Archives*, 9(6). <https://doi.org/10.18103/mra.v9i6.2427>
- White, C. J. M., Kelly, J. M., Shariff, A. F., & Norenzayan, A. (2019). Supernatural norm enforcement: Thinking about karma and God reduces selfishness among believer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84, Article 103797. <https://doi.org/10.1016/j.jesp.2019.03.008>
- White, C. J. M., & Norenzayan, A. (2019). Belief in karma: How cultural evolution, cognition, and motivations shape belief in supernatural justice. In J. M. Olson (Ed.),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pp. 1–63). Elsevier Academic Press.
- White, C. J. M., Willard, A. K., Baimel, A., & Norenzayan, A. (2021). Cognitive pathways to belief in karma and belief in God. *Cognitive Science: A multidisciplinary Journal*, 45(1), Article e12935. <https://doi.org/10.1111/cogs.12935>
- White, M. A., & Kern, M. L. (2018). Positive education: Learning and teaching for wellbeing and academic maste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Wellbeing*, 8(1), 1–17. <https://doi.org/10.5502/ijw.v8i1.588>
- Worthington, E. L., Jr., Witvliet, C., Pietrini, P., & Miller, A. J. (2007). Forgiveness, health, and well-being: A review of evidence for emotional versus decisional forgiveness, dispositional forgivingness, and reduced unforgiveness. *Journal of Behavioral Medicine*, 30(4), 291–302. <https://doi.org/10.1007/s10865-007-9105-8>
- Wu, M. S., Yan, X., Zhou, C., Chen, Y., Li, J., Zhu, Z., Shen, X., & Han, B. (2011). General belief in a just world and resilience: Evidence from a collectivistic culture. *Europea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25(6), 431–442. <https://doi.org/10.1002/per.807>

收稿日期：2024 年 05 月 21 日
一稿修訂日期：2024 年 05 月 25 日
二稿修訂日期：2024 年 05 月 27 日
三稿修訂日期：2024 年 09 月 03 日
四稿修訂日期：2024 年 10 月 28 日
五稿修訂日期：2024 年 11 月 11 日
六稿修訂日期：2024 年 11 月 20 日
七稿修訂日期：2024 年 12 月 27 日
接受刊登日期：2024 年 12 月 27 日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25, 56(3), 733–768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R.O.C.

Contemplation of Morality and Well-Being: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Multi-Dimensional Beliefs about Congruent Good

Yu-Chieh Lin¹ and Shun-Wen Chen¹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ality and well-being is a significant topic in moral philosophy, proposed since the inception of Eastern and Western philosophies, and has sparked considerable thought and discussion. This article refers to the “beliefs about how morality and well-being are related” as “beliefs about congruent good” (BCG). Exploring the content of BCG is of great importance, whether from abstract philosophical thoughts or concrete practical applications. In terms of thought, the issue of the morality-well-being relationship involves the nature and criteria of morality and well-being. In terms of application, moral education, well-being education, and public policy often cite the discourse of BCG.

Previous psychological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ality and well-being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research paradigms: well-being theories and justice beliefs. The well-being theories paradigm attempts to identify the act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well-being and morality, thereby establishing constructs and collecting empirical data. The justice beliefs paradigm approach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ividual subjective beliefs, suspending the issue of the act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ality and well-being, and exploring the cognitive and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of justice beliefs. However,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neither research paradigm has provided an effective and clear analysis of BCG, thus limiting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the theory. The reason may be that the current psychological research paradigms on the morality-well-being relationship are insufficiently inclusive of the philosophy of BCG, leading to partial or simplified explanations of BCG.

The well-being theories paradigm can be further divided into two main approaches: The hedonic well-being perspective and the eudaimonic well-being perspective. These differing viewpoints form two different constructs of well-being: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The hedonic perspective emphasizes “subjective well-being,” which refers to an individual’s subjective experiences and mental states; the eudaimonic perspective emphasizes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which refers to an individual’s objective psychological functions and traits. The hedonic perspective adopts an instrumental relationship stanc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ality and well-being, with the most common research topic be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ltruism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Supporters of the eudaimonic perspective believe that the ideal state of humans is quite diverse, thus proposing many theories to describe various aspects of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nd particularly emphasi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irtue and well-being, conducting numerous empirical studies to examine whether 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or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eudaimonic perspective on well-being has several shortcomings when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ality and well-being. First, the eudaimonic perspective is based on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virtue ethics, with a specific normative ethical stance that presupposes the “congruence of morality and well-being,” making it difficult

¹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and Counseling,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Corresponding author(s):

Shun-Wen Chen,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and Counseling,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Email: psychen@yahoo.com.tw

to explore other directions of BCG. Second, the “virtue” in the eudaimonic perspective, as a core concept of virtue ethics or character strengths, does not entirely equate to “morality,” but broadly refers to various domains of excellent attributes. More clearly, in the eudaimonic well-being theory, the meaning of “virtue” is closer to “well-being,” which is a necessary component of well-being. Furthermore, although the eudaimonic well-being perspective describes some existing phenomena of congruence between morality and well-being, it does not explore how people interpre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ality and well-being, including explanations of congruent and incongruent phenomena. Fourth, the eudaimonic well-being perspective defines well-being using certain normative standards but finds it difficult to propose a common standard to measure theoretical discrepancies. Compared to the eudaimonic perspective, the hedonic perspective does not presuppose a specific stance on the morality-well-being relationship but thus needs to propose theories to explain the unstabl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al behavior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Justice beliefs include the belief in a just world and supernatural beliefs such as karma. These beliefs all involve the concept of “fair reciprocity”: Repaying those who help oneself with kindness, honesty, and cooperation, or distributing benefits to those who deserve them. Conversely, those who violate moral behavior are avoided or punished. These beliefs are reflected in many social interactions, whether in the intuitive preferences exhibited by young children or the moral concepts endorsed by different cultures. In summary, the above beliefs ultimately lead to the congruence of morality and well-being, where “good is rewarded with good, and evil with evil.”

Although research on justice beliefs can partially describe beliefs about the morality-well-being relationship, it also has shortcomings. First, the belief in a just world describes the simple notion of proportional retribution, but on the one hand, it oversimplifies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morality-well-being relationship, failing to further explore the various possibl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two; on the other hand, the meaning of “proportional retribution” is broader than “congruence of morality and well-being,” encompassing non-moral domains (e.g., work rewards, interpersonal emotions). Supernatural justice beliefs (including beliefs in God and karma) focus on explaining and supporting “congruence of morality and well-being” through supernatural mechanisms, thus emphasizing the nature of the supernatural mechanisms themselves rather than the content of the morality-well-being relationship. For example, beliefs in God view God as personal, omniscient, omnipotent, moralized, monotheistic or polytheistic, strict or lenient; beliefs in karma focus on the operation of karma, such as reincarnation, balancing merits and demerits, but the descriptions of the morality-well-being relationship often remain general concepts. Second, justice beliefs focus only on the moral cognitive aspect of “justice” or “fairness.” However, in both ethics and moral psychology, the concept of “justice” is only a part of moral cognition, not encompassing all moral thinking and practice. Furthermore, daily experiences and philosophical thoughts often associate morality with inner well-being states such as peace, harmony, and satisfaction. Since justice beliefs focus on the fairness between external behavior and rewards, they often fail to consider related aspects of BCG.

To better understand people’s BCG, this article proposes a psychological conceptual model of “multi-dimensional beliefs about congruent good” (MBCG). This model divides BCG into four fundamental constructs: Internal congruence, external congruence, positive congruence, and negative congruence. “Internal congruence” refers to the degree to which one believes in the congruence between morality and internal well-being; “external congruence” refers to the degree to which one believes in the congruence between morality and external well-being; “positive congruence” refers to the degree to which one believes that doing good enhances well-being; “negative congruence” refers to the degree to which one believes that doing evil harms well-being. These four fundamental constructs can be further combined into four composite beliefs: Internal positive congruence, internal negative congruence, external positive congruence, and external negative congruence.

We believe that the psychological conceptual model of MBCG can not only supplement the deficiencies of existing theories but also explain richer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phenomena and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practical applications. This article illustrates three issues as examples: MBCG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donic and eudaimonic well-being, the integration of multiple moral motivation aspects using MBCG, and MBCG buffering the victim-blaming effect of the belief in a just world. Additionally, we further propose hypotheses about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MBCG and several psychological or behavioral variables a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subsequent empirical research to test criterion-related validity. These include morality-related variables: The belief in a just world, moral identity, altruism, moral foundation, moral disengagement, and well-being-related variables: Resilience, forgiveness, and revenge.

In summary, the psychological conceptual model of “multi-dimensional beliefs about congruent good” proposed in this article can compensate for the deficiencies of existing theories and more clearly understand people’s various belief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ality and well-being in daily life. Applying the conceptual model of “multi-dimensional beliefs about congruent good” to make inferences can help clarify the confusion or contradictions in existing theories. In the future, measurement instruments for the psychological conceptual model of “multi-dimensional beliefs about congruent good” can be developed, and the relationships and mechanisms between beliefs about congruent good and other moral psyche and behavior can be explored. This will provide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many related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phenomena and can further offer practical recommendations for moral practice and education.

Keywords: beliefs about congruent good, moral psychology, well-being, justice beliefs